

红旗

一九七五年 9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五年第九期 目 录

用《水浒》做反面教材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鲁迅论《水浒》..... (5)

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 (6)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论述.....方岩梁 (8)

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评《水浒》.....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13)

评《水浒》的投降主义路线.....钟 谷 (18)

叛徒的颂歌.....山东利津县回乡知识青年 赵安亭 (26)

思 想 评 论

加强体育队伍的思想建设.....郭 育 (33)

进一步抓好农村卫生工作.....韦 革 (36)



共产党员要增强党的观念.....闵 雪 (39)

坚持精兵简政.....兰 文 (43)

学 习 理 论 反 修 防 修

掌握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燕 枫 (47)

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法权

——学习《国家与革命》第五章.....钟 实 (51)

总结经验 促进学习.....李 扬 (56)

工人阶级也要不断学习和改造.....洪 滨 (58)

深入学习理论必须端正学风

.....中国共产党盘锦地区委员会 (63)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翻身农奴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

——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朱 锋 (67)

依靠群众赢得了高速度.....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筹建指挥部 (74)

努力把基本建设搞得更好.....姚 尚 (78)

在抗灾斗争中锻炼得更坚强

.....山东诸城县新河崖大队党支部 (83)

☆八月二十八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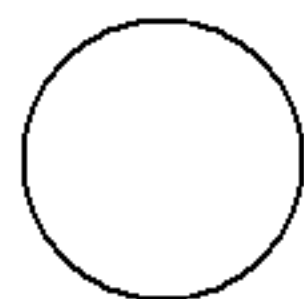
毛主席语录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



毛主席语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
是决定一切的。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
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
全国知道。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
地建设社会主义。



毛主席语录

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毛主席语录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用《水浒》做反面教材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鲁迅论《水浒》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
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
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
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
是奴才。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
第四卷第一百二十三页）



重视对《水浒》的评论

(短评)

为了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批判,本刊这期发表了鲁迅对《水浒》的一段评语,希望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这个评语,完全正确。它指出了《水浒》的要害是“受招安”,即投降。原因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写了投降的全过程,歌颂了投降主义路线,使它可以用来作为一部有意义的反面教材。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水浒》是怎样对待梁山农民起义革命事业的奠基人晁盖和农民起义的叛徒宋江的呢?它极力歌颂宋江,而把晁盖排除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这完全是为了宣扬投降。晁盖死后,宋江窃取了梁山农民革命的领导权,他第一件事便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强行通过了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宋江对晁盖起义路线的“修正”,是对农民革命的背叛,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搞修正主义。而《水浒》正是肯定和赞美了宋江的修正主义。当然,有投降,就有反投降。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不愿意投降,坚持了农民革命的立场。但由于领导权掌握在宋江手里,终于使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受了“招安”,去打方腊,做了反动统治阶级镇压其他起义军的帮凶。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证明: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这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特点。刘少奇、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阶级分析,《水浒》所描写的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其实质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是地主阶级内部一个派别的代表人物,他不反对皇帝这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最高代表,他反对贪官,不过是为了效忠于皇帝,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在统治阶级内部争得一席之地而已。认清宋



江这一阶级本质,对于我们识破修正主义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是很有意义的。为什么宋江能起到高俅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什么高俅的残酷镇压不能打垮梁山农民起义军,而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却能很快瓦解这支队伍?这是因为,钻进农民革命队伍的宋江以他同高俅的“斗争”掩盖了他们同属地主阶级的实质,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一派反对另一派的矛盾。这样,宋江就有机可乘,使投降主义路线得逞。李逵由于缺少阶级分析的观点,虽然没有壮烈地死在高俅的屠刀下,却让宋江用毒酒断送了性命,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值得革命人民永远记取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关于《水浒》的许多评论,几乎都违背了鲁迅的论述。不少文章美化甚至歌颂《水浒》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其中一个基本的论点就是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了“农民的局限性”。于是,投降派变成了英雄,农民起义的结果必然走向投降,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和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原则斗争统统被抹煞了。请问:斗争不屈而失败,同宋江为追求“官爵升迁”而投降,怎么能说成一回事?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往往陷于失败,但投降绝不是它的必然结果。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农民的局限性”,实质上是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这是必须加以讨论和澄清的。

这里,重温一下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很有必要的。毛主席说,象武训那样的人,**“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毛主席还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毛主席的这些深刻分析,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批判,肃清《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的流毒,是完全适用的。《水浒》这部小说中的宋江,同《武训传》中的武训是一丘之貉。歌颂叛徒宋江,同歌颂奴才武训,是同样性质的问题。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学习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各种问题。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加强革命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论述

方 岩 梁

《水浒》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好作品，还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宋江究竟是革命派，还是投降派？这是重大的原则问题。鲁迅早在一九三〇年一月发表的《流氓的变迁》一文中，在分析了《水浒》中“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以后，就深刻地对《水浒》作了如下的评论：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这段精辟的议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揭穿了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的宋江这类投降派的真面目。《水浒》只反贪官，不反对皇帝，就连那个腐朽的宋徽宗，也被歌颂为“至圣至明”的天子，说他“求贤”，“爱民”，“博施济众”，不好的只是高俅等几个“奸臣”。一部《水浒》被冠之以“忠义”二字，忠于谁呢？当然只能是忠于皇帝，忠于朝廷。宋江直到临死前，还一再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说宋江是投降派，“终于是奴才”，有些人是不同意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宋江是农民起义的“非常杰出的领袖”，代表了整个农民阶级的意志、愿望，甚至连他的投降也是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究竟是鲁迅正确，还是这些人的观点正确？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宋江这个人物“杰出”在什么地方。

我们判断一个人究竟代表哪个阶级，并不仅仅看他的出身和职业，而是看他的思想和行为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所实行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政治路



线。宋江在上梁山以前，就对要去二龙山入伙的武松说了一段推心置腹的私房话：“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擢擢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番话，是宋江的丑恶灵魂的自我暴露。他终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要“擢擢”农民起义军投降，把他们引进地主阶级的屠场；同时，他自己踏着农民起义军的尸体爬上去，借以升官发财，封妻荫子。他唠唠叨叨嘱咐武松去做的也就是这件事。所以他一上梁山，就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用他的投降主义的路线代替了晁盖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他把晁盖的聚义厅改成忠义堂，一字之差，却反映了农民和地主这两个对立阶级的不同的世界观。“聚义”是要起义，要革命；而“忠义”则是要招安，要投降，这不明明白白地反映了两条路线的对立吗？

宋江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号。他心目中的“天”，就是皇帝和朝廷；他所行的“道”，就是孔孟之道，就是要帮助宋王朝瓦解和镇压农民起义，以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他口口声声说要“保国安民”：“保国”，指的是保卫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权；“安民”，就是自己当奴才，还要别人也都跟着他去当奴才。就在梁山“大聚义”那一天，宋江乘兴写了一首《满江红》，下令乐和单唱：“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结果在梁山泊山寨中激起了一片反对声。但这丝毫没有能动摇宋江“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的反革命决心。他一投降，就马上率领大军打方腊，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他代表的是哪个阶级的意志和愿望，难道还不够清楚吗？宋江是帝王将相和整个地主阶级的鹰犬。对于这样的鹰犬，《水浒》竭尽美化歌颂之能事，吹捧成忠孝仁义色色俱全。这种歌颂正好证明了它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曾经追根溯源，指出从孔墨儒侠到《水浒》，直到清代的《施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之类，前后一脉相承。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也说过，《七侠五义》这类小说中的侠客“很象《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事实上，宋江同黄三太、黄天霸、展昭之流都是一路货，说得明白点，无非是皇帝或者所谓“清官”的奴才、走狗和保镖。



我们再把宋江与高俅比较一下，更可以发现这两个人有许多共同点。他们一样的是“浮浪子弟”，一样的想升官发财，又一样的被发配充军，归根到底，他们所属的阶级是一样的。有没有不一样呢？有。高俅狗运亨通，因为踢得一脚好球，被“九大王”、即后来的徽宗皇帝看中了，因而“发迹”得早，当了官；而宋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年命蹇滞”，成了“寇”。其实这两个人，殊途而回归，宋江是由官暂时入“寇”，再由受招安而重新变成官；而高俅呢，一下子就当了官。宋江在浔阳楼写的所谓“反诗”，有人以为他真要造反，其实他不过是在“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的情况下大发其牢骚罢了。“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这不正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怀才不遇”心理的绝妙的自我写照吗？在宋江看来，当穷途潦倒的时候，投机“造反”可以说是一条捷径。“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鲁迅说：“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的结语。”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并不属于革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而只是地主阶级反动派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但是，不管他们怎样你争我斗，终究是一丘之貉。就破坏农民革命运动和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来说，宋江的作用实际上要比高俅大得多，他比高俅更富有欺骗性。

宋江不是号称“及时雨”吗？他究竟是哪个阶级的“及时雨”呢？《水浒》称颂宋徽宗的年代“国富民安，士农乐业”，实际上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的烈火遍地燃烧，北宋王朝的大厦摇摇欲倾。赵佶在自己的“睿思殿”即书房的素白屏风上，书写着“四大寇”的姓名，可见他为此而日夜悬心。结果呢，“四大寇”之一的宋江，不但投降了这位赵官家，而且帮他镇压了另外三支农民起义军，这对北宋王朝和赵佶不是一场道道地地的“及时雨”吗？在历史上，每当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以至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无法维持的时候，反动阶级总是特别需要宋江这类“及时雨”来浇灭农民起义的烈火。《水浒》这部书和宋江这个形象为地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所特别赞赏，原因正在于此。

金圣叹把《水浒传》砍去了二十多回，强调对宋江这样的“盗魁”，只能斩尽杀绝，决不容许招安。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谈金圣叹》的文章，批判金圣叹：“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



就昏庸得可以。”金圣叹之“昏庸”，首先在于他不懂得起义的农民是斩不尽、杀不绝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别说一个“嵇叔夜”，一百个“嵇叔夜”也没用。金圣叹之“昏庸”还在于他没有看懂施耐庵、罗贯中写《水浒》的真正用意，他们正是站在金圣叹同一阶级立场上反对农民起义，才塑造和歌颂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形象。他们懂得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金圣叹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他没有看破宋江这号人根本不是“盗魁”，而是地主阶级的忠实的代理人。鲁迅还生动地把《水浒》被砍的本子比喻为“断尾巴蜻蜓”。宋江投降，受招安，打方腊，这是他的投降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把这一半砍去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面目就不真实了。金圣叹这一砍，由于砍掉了宋江的许多罪恶行径和丑恶表演，颇受许多为宋江唱赞歌的人们的欢迎。

“替天行道”的强盗同“不‘替天行道’的强盗”是有严格区别的。鲁迅明确指出，前者是道道地地的投降派，而后者才是反剥削、反压迫、反奴役的起义农民。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事实上，即使在梁山起义军的内部，也是一分为二的。起义军多半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也有不少是地主阶级的破落户子弟，反动军队的士兵和军官。由于宋江在政治上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在组织上招降纳叛，拉进了大批宋王朝的高级将领，使这支起义军领导集团的阶级成分起了变化。在一百零八将中间，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他们不愿意投降。吴用和阮氏三兄弟是最早跟着晁盖起来造反的。李逵更是梁山起义军中斗争最勇敢、最坚决的一个。他一听到乐和唱宋江做的那首《满江红》，就睁圆双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一脚把桌子踢起，掀个粉碎。他根本不把大宋皇帝放在眼里，宋江不反，他要反。太尉陈宗善进山寨颁布朝廷招安的诏书，李逵不仅一把夺过诏书，扯得粉碎，还劈胸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直到小说最后，李逵一听说朝廷送来了药酒，就大叫：“反了罢！”所以宋江最不放心的就是这股“黑旋风”，一定要将他先搞死才肯闭上自己的双眼，用心实在恶毒极了。宋江同李逵们之间的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投降主义路线同坚持起义的路线这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为宋江辩护的人，还抬出了一个“义”字来当挡箭牌，好象宋江同所有的人都是义重如山，亲如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还分什么阶级，什么路线，什



么投降派和革命派？鲁迅对于《水浒》中流传的这句口号，用一句话就戳穿了它的虚伪性：“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事实正是如此。别说在四海之内，就是在梁山泊之内，也决不是什么兄弟关系，而是阶级关系。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的对立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梁山起义军的内部来。宋江张口一个“忠”，闭口一个“义”，他对上是忠得很，对下又何尝把所有的人都当兄弟看待！第八十三回“陈桥驿滴泪斩小卒”，就充分暴露了宋江的“义”的虚伪性。当招安的丑剧刚刚收场，起义军中一个军校激于义愤，杀了一个辱骂起义军的厢官。这下可吓坏了宋江，他马上要砍下军校的头，到朝廷请罪。可是还得照顾一下“义气”，于是宋江使出他惯用的猫哭老鼠的本领，“哭”了起来，叫那军校“痛饮一醉”，自己去上吊，然后再割下头来号令示众。头也砍了，“义”也尽了。对“义”的内容要作阶级分析。晁盖“聚义”，是要团结起来造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反；而宋江讲“义”，是要用“义”来掩盖阶级的对立，调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让被压迫阶级俯首帖耳地给反动统治阶级当奴隶，还有比宋江这种“义”更符合反动统治阶级的需要吗？李逵的悲剧正在于他吃了这种“义气”的亏，被这个“义气”蒙住了眼睛，只认“哥哥”，不认路线，识不破宋江的反动真面目，最后终于成了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牺牲品，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鲁迅作为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宋江这类以革命者的姿态干反革命勾当的投降派是深恶痛绝的。特别是当他经历了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刀光和血光之中，既看到了真正的革命者的坚贞不屈，也看透了形形色色的投降派的鬼域嘴脸。“大军一到，便受招安”，马上为虎作伥，帮着反动派屠杀革命人民的是一种；始终披着革命者的外衣，而对真正的革命者却大布围剿阵的又是一种。鲁迅写《流氓的变迁》一文，不正是要要求人民群众警惕宋江一类投降派吗？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者，鲁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解剖《水浒》，并把现实的阶级斗争同历史的阶级斗争相对照，所以他对这部书才看得那样分明，分析得那样鞭辟入里，入木三分。我们应当认真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论述，提高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识别能力，为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



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评《水浒》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一部《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它既不是什么“农民革命的史诗”，也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教科书”，而是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水浒》的要害是投降，它的好处就在于可以使人民知道什么是投降派。

《水浒》虽然以农民起义为题材，但它却从根本上歪曲了农民的革命斗争。作者通过精心塑造并竭力美化梁山领袖宋江，来达到他鼓吹投降、反对革命的目的。宋江不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而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究竟对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是“造反有理”，还是“造反有罪”？是推翻以宋朝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王朝，还是“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维护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是坚持斗争，宁死不屈，还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接受招安，充当奴才？在对待这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充分暴露了投降派头子宋江的真面目和《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本质。

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者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被压迫人民对反动派造反有罪。《水浒》中的宋江，跟一切反动派唱的正是同一个腔调。晁盖、吴用、阮氏三兄弟等“聚义”起事，“智取生辰纲”，把封建统治者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血汗夺回来，宋江却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说这种革命行动是“犯了迷天之罪”；晁盖等人抗击封建王朝的武装镇压，打得官军落花流水，宋江又认为是干下了“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晁盖等人上了梁山，走上了与封建政权对抗的革命道路，宋江对他们“直如此大弄”，更是惊骇万分。总之，农民阶级的一切革命行动，在宋江的眼里都是无法无天，简直糟得很。

在宋江看来，造反上山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他外出避难，只有贵族柴进的门下，花荣的官军营寨，孔明的地主庄园，才是他心目中的安身之处，唯独不想去投奔晁盖。即使投案自首，刺配江州，也宁做阶下囚，



不上梁山泊。只是由于“名又不成，功又不就”，误题“反诗”，被判死刑，梁山好汉劫了法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万不得已，他才上山，“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其实，这只不过是“勉从虎穴暂栖身”。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晁盖在梁山上实行的正是一条反抗封建统治、发展农民革命的路线。他们“整点仓廩，修理寨栅，打造军器”，“安排大小船只，教演人兵水手”，与封建统治者势不两立，随时“防备迎敌官军”。在晁盖的领导下，梁山的一些普通头领也具有反抗封建王朝、反对皇帝的革命思想。朱贵在梁山酒店里捉住戴宗，拆了九江知府送给太师蔡京的信。戴宗呵斥他：“把太师府书信擅开，拆毁了封皮，却该甚罪！”他蔑视地笑着说：“休说拆开了太师府书札，便有利害，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

《水浒》的作者对晁盖的这条革命路线是仇视的。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需要，他不仅把宋江送上梁山，而且有意让晁盖中箭身死。原来在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和《大宋宣和遗事》中，晁盖都在三十六人以内。而在《水浒》中，作者却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无论三十六天罡，还是七十二地煞，都没有了晁盖的位置。《水浒》的作者说：“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十分清楚，晁盖蔑视皇权，对抗封建王朝，所以要他“归天及早”；宋江“尽忠报国”，能把梁山起义军引向投降，所以让他“把寨为头”。

宋江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尽管正厅上香花供奉起晁盖的牌位，上面大书“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但是，聚义厅已经改为忠义堂，全面篡改了晁盖的路线。从此，“替天行道”就正式成为宋江在梁山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口号。“替天行道”究竟是什么货色？早在宋江上山之初，作者就通过九天玄女的口告诫他：“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可见，“替天行道”就是承认封建皇权至高无上，替最高统治者维护和巩固封建秩序，取消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把农民起义纳入地主阶级的轨道。

路线变了，政权的性质也就变了。梁山上投降主义路线的头子宋江掌权，意味着农民阶级的革命政权变为替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权。宋江软硬兼施，用反革命的两手镇压革命派。他经常说什么“情分最重”，讲什么“死生相托”，这是他握在手里的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无非是诱骗大家围着他的指挥棒转；谁要是不



把宋朝皇帝放在眼里，坚持把农民起义的事业进行到底，反对投降，他就凶相毕露。李逵反对招安，宋江立即要把他推出斩首，只是由于众人讲情，才寄下“项上一刀”，“再犯，必不轻恕”。然而，他对钦差大臣，朝廷命官，乃至前来“征剿”的反动将领，则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动辄“纳头便拜”，口称“死罪”。宋江对谁亲，对谁恨，究竟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实行什么阶级的专政，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这是九天玄女嘱咐宋江的两句“天言”。原意是说：遇见“忠臣”宿元景是喜上加喜，即使碰见“奸臣”高俅也不是什么凶险。宋江和高俅的矛盾是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他们之间的斗争，是地主阶级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表面看来，宋江也曾不断与北宋官军对阵交锋，他带兵攻打过高唐州、华阴县、大名府，抗击过高俅、童贯的多次“征剿”。但这只不过是反对以高俅为代表的一伙“奸邪”，根本不触动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正如宋江一伙自己供认的那样：“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所以，仗打了一次又一次，而梁山泊的地盘却丝毫没有扩展。宋江一心想当奴才，哪里会去夺取宋室天下。

宋江身在梁山，心在朝廷，梦寐以求的是投入封建统治者的怀抱，骑在人民头上，升官发财，封妻荫子。为了达到这个卑鄙目的，他利用篡夺的权力，大造投降舆论。在一百零八人歃血为盟的誓言中，他说什么“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在菊花会上，他明目张胆地鼓吹“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还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大肆贩卖“忠孝”、“仁义礼智信”和“天命观”等一整套反动思想，妄图用孔孟之道的绳索，束缚梁山起义军的思想，捆住他们的手脚。

宋江一面大造反革命舆论，一面千方百计招降纳叛。他甚至把极端仇视农民起义的富豪将吏拉上山来，扩大投降派的势力。卢俊义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这个大名府的富豪在经过梁山时，竟准备下一袋麻绳，狂妄地要单人独马捉尽梁山好汉。而且，在被俘之后，又坚决不肯“入伙”。就是这样一个反动透顶的家伙，宋江却认为他“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贵人之相”，不仅拉他上山，而且请他坐了第二把交椅。从此，宋江找到了一个投敌叛变的得力助手。

为了投靠宋王朝，宋江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他不仅和所谓“忠臣”宿元景很早就拉上了关系，而且还向他视为奸邪的高俅卑躬屈膝，乞求招安。高俅被捉上梁山，宋江一见，慌忙扶上堂来，跪拜在地，并大摆了三天酒宴，馈赠了数千金礼



物，然后送出山寨，“专等招安消息”。宋江甚至亲自出马，溜进东京，与妓女李师师牵线，并派燕青走李师师的后门，企图讨到皇帝招安的“赦书”。

宋江叛卖革命的种种罪恶活动，引起了革命派的强烈不满和抵制。就在那一次菊花会上，宋江用《满江红》词鼓吹招安，立即遭到反对。李逵忿激地说：“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在宋王朝的几次招安活动中，阮小七目无天子换御酒，李逵撕毁诏书骂徽宗，吴用则指责宋江对招安太“执迷”了。这一切说明，梁山起义军的失败，完全是由于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而李逵、吴用、三阮等人是好的，他们是不愿投降的。然而，《水浒》的作者对于他们反招安的正义立场是不支持的，不仅对他们的每次反抗都要抬出宋江的“忠义”来压下去，而且还让这些反对投降的革命派最后都跟着宋江受招安、征方腊，对他们的形象进行了严重的歪曲。而对于宋江这个钻进农民起义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则自始至终采取了歌颂和同情的态度，把他屈膝投降说成是“去邪归正”，接受招安是“终成正果”，甚至把接受招安的场面作为盛大节日来描绘。这就充分暴露了作者维护封建统治、反对农民起义的反动立场。

宋江叛卖成功，便去镇压方腊起义，恶毒地咒骂起义农民是“贼寇”，把他们“剖腹剜心”，残酷屠杀革命人民。这同他在梁山对待官军将士的态度是多么鲜明的对照！鲁迅说得好：“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从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叛卖活动，到直接充当反动统治阶级的鹰犬，从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到赤裸裸地执行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治路线，这个变化过程，正是投降派的共同规律。

长期以来，对《水浒》的大量评论几乎都违背了鲁迅的论述，美化甚至歌颂《水浒》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其中一个基本论点，就是所谓“农民的历史局限性”。认为农民起义只反贪官污吏，不反皇帝，只反个别地主，不反封建政权，接受招安是“由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不能看作“出卖革命”。这完全是为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辩护的奇谈怪论。

中华民族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广大农民曾多次举行起义，前赴后继，不屈不挠，以反抗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唐代农民起义的领袖黄巢自



称“冲天大将军”；宋初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这都表明他们的斗争矛头是指向封建统治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说中国的农民起义不反皇帝，不反封建政权，这不仅否定了农民的革命性，而且抹杀了农民起义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

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和先进的政党，他们不可能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斗争最后总不免陷于失败。尽管斗争失败了，但总是打击了封建统治，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绝不能把这种失败和投降混为一谈。是坚持斗争，还是一心投降，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坚持斗争，就是坚持农民反封建的革命立场；而叛变投降，则适应地主阶级维护反动统治的需要。《水浒》中以宋江为头子的投降派，宣扬叛徒哲学，策动农民起义军向地主阶级投降。这种无耻的叛卖行径和“农民的历史局限性”有什么相干？斗争不屈而失败和追求升官发财而投降有什么共同之处？抹杀这两者的区别，混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的原则界限，是不折不扣的阶级调和论。

《水浒》研究中出现这种阶级调和论，不是偶然的，它和吹捧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美化封建奴才武训，歌颂农民革命的叛徒李秀成一样，都是政治思想战线上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表现。其中贯穿着一条黑线，就是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阶级合作的思想。”（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刘少奇、林彪一类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从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出发，总是利用封建文化、历史渣滓，鼓吹卖国主义、奴才思想、叛徒哲学，为他们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叛变革命制造舆论。

《水浒》是反面教材。宋江其人，不足为训。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地地道道的孔孟之徒，混进农民起义队伍，披着“仗义疏财”、“待人谦和”的种种伪装，骗取了梁山起义军的信任，干的是从堡垒内部攻破革命事业的罪恶勾当，起到了宋王朝的文官武将起不到的作用。从这个反面教员身上，可以认识什么是投降派。因此，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批判《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划清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的界限，使人民都知道什么是投降派，这对于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应当充分发挥《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评《水浒》的投降主义路线

钟 谷



北宋末年，爆发了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有关这次起义的故事传说，广泛地流传了大约两个半世纪，到元末明初，施耐庵、罗贯中才把它写成了长篇小说《水浒》。

《水浒》故事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逐渐渗入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思想。适应着地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的反革命政治需要，长篇小说成型的时候，宋江已经被作者塑造为一个投降派的典型，涂抹成一个满脑袋儒家思想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小说歌颂了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宋江路线推行的结果，使梁山泊的农民武装变了质，被封建统治者用作鹰犬去镇压方腊起义，最后落了个“兔死狗烹”。这里面包藏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险恶阴谋，实际上是让各股农民起义军在自相残杀中旗倒人亡，而他们却坐收“渔人之利”，从而达到镇压农民起义的根本目的。所以，《水浒》的要害是投降，它是通过宣扬投降主义路线以瓦解农民起义的一部小说。

《水浒》描写了梁山泊农民起义事业的逐渐发展壮大和接受招安、走向失败的全部过程。分析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自始至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正确，就发展壮大，路线错了，就把起义事业整个断送掉了。由于农民起义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斗争任务不同，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焦点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就《水浒》说，是两大阶段：大聚义以前，主要是正确的组织路线与关门主义、招降纳叛的对立；大聚义以后，集中地表现为争取招安与抵制招安的斗争。

最初占据梁山的王伦是一个“落第腐儒”，他自私狭隘，嫉贤妒能，实行关门主义，阻碍着起义事业的发展。林冲火并王伦，夺了他的权，是开创革命基地的



必要措施，是正义的行动。

接着，晁盖做了梁山泊的领袖。他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坚持武装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展起义队伍。晁盖一上山，立即组织起义军的力量，水陆配合，干净利落地消灭了“进剿”的官军，扎定了阵脚，稳住了局面。他和吴用、阮氏三兄弟等人亲密合作，屯粮、造船、造军器，操练人马，准备迎接更大规模的战斗。继而通过“白龙庙小聚义”、“三打祝家庄”、“三山聚义打青州”等多次战斗，狠狠打击了贪官污吏和土豪地主，并把李逵、鲁智深、武松、李俊等起义英雄接应到梁山山寨。晁盖任人唯贤，论功排座，明确宣告山寨的胜利“皆托众弟兄的才能”，使得起义军团结兴旺，迅速壮大，为梁山起义事业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晁盖原属地主阶级，但他背叛了本阶级，在起义英雄中颇有威望，“智取生辰纲”的集体斗争就是由他组织和领导的。案情被官府侦知以后，他放火烧了自己的庄院，率众拒捕，决心投奔梁山。晁盖是通过打击贪官污吏、反抗封建官府的斗争实践，从地主阶级的营垒中分化出来而投身于农民起义的队伍之中的，他具有坚定的斗争精神，能够执行正确的农民起义路线。但《水浒》的作者竟然把晁盖排斥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并且让他中箭身亡，这完全是出于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政治意图而作的安排。

晁盖死后，宋江窃据了梁山泊的领导地位。他一上台，就把梁山泊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是他修正晁盖的农民起义路线，篡改农民起义军的性质的第一个明显信号。

在扩大梁山队伍的问题上，宋江接过了晁盖“招接四方入伙好汉”的旗帜，却塞进了他自己的黑货，大搞招降纳叛的活动。宋江的招降纳叛与王伦的关门主义走的是两个极端，但从路线上看，二者的根本性质是一致的，都是与农民起义的正确组织路线相对抗的。

宋江迫不及待地设下计谋，首先把卢俊义请上山。卢俊义本是大名府的一个大地主，专与农民起义军作对头，立志要使梁山泊“人人皆死，个个不留”，但却被宋江请到了山上。宋江说得很清楚，他就是要让卢俊义来带领梁山好汉“归顺朝廷”。他不但看中了卢俊义的所谓名声地位、武艺才干，甚至连卢俊义的身貌仪



表也被他认为是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有利条件。后来，宋江又多次对俘获的朝廷军官“亲解其缚”、“纳头便拜”，收罗了一大批降将。在劝说这些军官“入伙”时，宋江所使用的言辞是大同小异的，它的核心内容就是宣布他准备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这些军官已经损兵折将，与其回到朝廷被问罪，倒不如权借梁山避难，日后图升迁，于是，等待招安就成了他们“入伙”的基本条件。

上层人物麇集梁山，改变了起义军将领中阶级成份的比例，这是宋江为最后实行投降而在组织上所做的准备。宋江还把这些人物安插在重要的位置上，卢俊义坐了第二把交椅，其他人也多在“五虎将”、“八骠骑”之列。宋江已经篡改了晁盖的任人唯贤的原则，而把上山以前社会地位的高低作为排座次的主要依据。所以，一百零八将梁山聚义，表面看来似乎是起义军兴旺壮大的发展高峰，其实却是宋江进一步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把起义事业引向失败的转折点。

离开了共同的阶级立场和正确路线，团结就势必成为一句空话。所谓“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论“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兄弟称呼，不分贵贱”，“如念珠子，个个连牵”等等，都不过是骗人的鬼话。正如鲁迅所说：“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阶级调和是搞不成的，用超阶级的“义气”思想维系着的表面团结是不能持久的。

大聚义之后，农民起义向何处去？是继续前进，推翻封建王朝呢？还是争取招安，向封建王朝投降？梁山泊面临着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的严重问题，招安与反招安成了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我国古代封建统治者用来对付农民起义的手段，除了残酷的武装镇压以外，还往往采取阴险的政治欺骗的办法。例如南宋时代，封建王朝由于自身的软弱，更多地采取所谓“抚”的一手，创设了“镇抚使”之类的官职，让接受招安者充任，使之镇压所辖地区的农民起义。封建统治阶级对待农民起义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使得农民起义队伍中往往会出现招安与反招安两条对立的路线，这是符合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的。比起武装镇压来，招安政策对封建王朝更有利，因而，《水浒》大力歌颂宋江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完全是迎合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反革命需要。



小说的第七十一回，写了一个“菊花之会”，两条路线的代表人物之间展开了第一次尖锐的正面冲突。宋江召集全体将领，宣布他的投降主义路线：“望天王降诏，早招安”。主张正确路线的起义英雄纷纷表示反对。李逵愤怒地踢翻酒席，大骂起来：“招安，招安！招甚鸟安！”武松沉痛地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鲁智深则用直裰染皂不能洗白的比喻说明“招安不济事”，明确地表示，要招安，就散伙。菊花会上，李逵强烈地反对招安，几乎被宋江杀头，可见两条路线斗争尖锐、激烈的程度。宴会结束时，对宋江的招安主张，“众皆称谢不已”。交锋的结果，投降主义路线占了上风。

《水浒》里的农民起义路线的具体内容，可以用李逵不止一次地宣称过的口号来表述，那就是：“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起义英雄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最高封建统治者，他们要推翻现有的王朝，打倒现有的皇帝。这条路线，充分体现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革命精神，体现了革命农民在与阶级敌人英勇斗争中的坚定性。

梁山泊里的路线斗争是很激烈的，双方的营垒有个明显的分界：出身下层的和真正从封建阶级当中分化出来的起义英雄们是反对招安的；那些出身上层，对当朝皇帝忠心耿耿，权借梁山避难的人们，则跟随宋江走招安的道路。前一类英雄主要是受剥削、受压迫最深重的劳动人民，现实生活中的贫困与不平，激发了他们的反抗斗争，他们那种强烈的革命精神是极其可贵的。后一类人物就不然了，他们本身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成员，与王朝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被迫上山，身在水泊，心怀朝廷；他们只能从切身遭遇和个人恩怨出发反对某些贪官，而他们的与某些贪官的矛盾斗争也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和那一派之间的矛盾斗争。

宋江依靠着起义队伍中的一大批上层出身的人物，利用了他在起义军中窃取到的地位和权力，特别是利用了起义英雄们由于受到“义气”的束缚而对他的信赖，强制地推行了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小说作者在大力宣扬这条反动路线的同时，对起义英雄们的抵制行动也作了一些描述，例如：李逵撕诏书，痛打陈太尉，阮小七偷换御酒，李俊、张横杀死俘获的敌将，都还算是比较突出的事例。



但是，作者不过是把些内容摆在陪衬的地位，在乌云漫天的形势下，他们的抵制并未能扭转局面。

宋江在推行投降主义路线，争取招安的过程中，与封建朝廷进行了一场肮脏的政治交易。他要卖身投靠，也必然要把农民起义军的实力当作他进身的本钱。三败高俅，两赢童贯，从宋江的目的来看，是为了打个样儿给皇帝看看，显示显示力量，以便在接受招安的条件上跟朝廷讨价还价。结果并不象宋江想的那么美妙，诏书虽然换了几次，但只不过是“敕令”与“安抚”的语气上有所差别，封建朝廷没有让步，宋江却露尽了摇尾乞怜的丑态。

为了早日得到皇帝的一纸招安诏书，宋江用尽了心机，使尽了种种卑鄙无耻的手段，地主阶级和封建官场中那一套腐败的东西他都使出来了。我们十分厌恶地看到：他和高俅握手言欢，举杯共饮，低三下四地拜托人家乞求皇帝恩赐招安；他派人带上金银珠宝偷偷地去宿太尉家送贿赂，托人情；甚至他自己还亲身潜入皇帝的姘头、妓女李师师家里去探听门路。这一切都说明，随着投降主义路线的步步推行，宋江这个封建统治者的忠实奴才的丑恶嘴脸，暴露得越来越清楚。

宋江有一个暴露的过程，人们对他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当诏书下来，接受招安已成定局，他向全体起义军宣布的时候，“当下辞去的，也有三五千”，许多士兵都不跟着他走了。一百零八将，由于“义气”的维系，暂时还没有散伙。但是，往日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象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被封建统治者利用去征方腊的过程中，一百零八将“十停去七”，死亡大半，剩下来的起义英雄也逐渐从血泊中认清了宋江路线带给他们的悲剧。

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结果，不但断送了梁山泊的农民起义事业，最后也断送了他自己。当他给封建统治者效过犬马之力以后，还是被御赐的毒酒杀害了。他临死还表白说：“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至死不忘投靠皇帝。至于立庙封神的尾声，一方面，不过是封建统治者赏赐给宋江这个忠实奴才的一点最后的精神安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布下新的钓饵，以免让宋江的可耻下场堵塞了其他人接受招安的道路。



从《水浒》所描写的农民起义事业的发展壮大和走向失败的全部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武装镇压，扑灭不了梁山泊的革命烈火，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却瓦解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路线决定成败，路线决定一切，这是我们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得到的启示。

《水浒》的全部内容，贯穿着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受了招安。正如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所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因为不反皇帝，所以宋江路线支配下的反贪官，就必然是从维护和巩固现有封建王朝的反动政治目的出发的，是奴才帮助皇帝整顿朝纲的一种效忠行为。受招安是忠于皇帝，反贪官也是忠于皇帝。与宋江路线相对立的“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农民起义路线，它的核心恰好是要打倒现有的皇帝。李逵等起义英雄也反贪官，但与宋江的反贪官有着本质的区别。起义英雄们是把反贪官作为农民革命的斗争任务之一，作为推翻现有封建王朝的必要步骤之一来看待的，他们的设想是从江州打到东京，反了贪官就反皇帝，自下而上，步步推进。所以，在《水浒》里，反不反皇帝，是区别农民起义路线和投降主义路线的分水岭，是鉴定英雄和奴才的试金石。

《水浒》大力宣扬的以忠君为核心的封建观念，是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

宋江出身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熏陶。他“于家大孝”，被称为“孝义黑三郎”；他又自称“呼保义”，以下级武官“保义郎”自居，表示了他对当朝皇帝的忠心。翻开《水浒》，宋江忠君孝亲的言行触目皆是。忠与孝，是宋江一生立身行事的根本指导思想。他理想的人生道路，他的所谓“凌云志”，也不外是“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为封建阶级建功立业，追求个人的升官发财而已。但是，在农民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宋江不但没有能够由刀笔小吏逐级升迁，反而在矛盾交错的现实生活中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波折，受到了贪官污吏的迫害，直到被梁山好汉从法场上解救出来，才不得已而上山的。宋江上梁山，并不是投身于农民革命，而是“暂占水泊，权时避难”，继续等待时机，报效



朝廷。他始终认为上梁山是“造恶甚多”，一直怀着诚惶诚恐而又焦灼急迫的心情等待皇帝“赦罪招安”。这便是宋江制定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

《水浒》大肆鼓吹的“替天行道”，是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政治纲领。

宋江上梁山之后，《水浒》紧接着就安排了“九天玄女授天书”的荒诞情节，所宣“法旨”的核心内容就是“替天行道”。这里，作者拣起了儒家“天人感应”、“天人合一”那一套，给宋江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涂饰了一层“天命论”的神秘色彩。“替天行道”的“天”，指的就是当朝天子宋徽宗；“道”，指的就是儒家所谓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道，也就是孔孟之道。在《水浒》的作者看来，封建皇帝是“君权神授”的“真命天子”，封建统治之道是合理的、长存的；宋徽宗是当朝的“圣明天子”，只因受了奸臣的闭塞，故而其道不行，所以才需要宋江那样的“星主”出来“替天行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也正是为了达到“替天行道”的目的。

宋江从“九天玄女”那里领来了“替天行道”的“法旨”，随即逐步地贯彻推行。晁盖一死，他就经常把这话挂在嘴边，到一百零八将大聚义的时候，也就是到了他大力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关键时刻，就在山顶上树起杏黄旗，把这四个大字的政治纲领亮了出来。“替天行道”这个口号在《水浒》中出现的时候，又往往和“全忠仗义”、“辅国安民”以及反对贪官污吏等等内容相提并论，用儒家那种虚伪的“爱民”谎言把它的实质加以装潢，所以它也就往往带有颇大的欺骗性。我们从反儒批孔的角度一分析，它的反动实质就看清楚了。宋江的“替天行道”与孔丘的“克己复礼”，一个是为了维系已经腐朽了的宋朝皇帝的封建统治，一个是为了维系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度，二者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反动货色。

《水浒》大肆鼓吹的“义气”，是宋江用以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策略。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水浒》里所描写的弥漫于农民起义队伍中的“义气”，是封建社会中的小生产者的一种道德观念。“义气”往往遮挡了起义农民的眼睛，使他们上当受骗。宋江正是利用了农民起义队伍中的“义气”，搞“结义拜盟”，耍两面派，使大批起义军将领象被戴上了枷锁似的，不得不让他牵着鼻子走。



宋江在上梁山以前，就惯用“乐善好施”之类的欺骗手段邀买人心。他是戴着“山东义士”的面具，顶着被吹捧起来的“及时雨”的大名声上了梁山的。上山以后，又用“仁慈宽厚”、“体恤弟兄”的笼络手段对待山寨将士，也曾经暂时骗取了起义群众的信任。当他的路线得以推行，受了招安，当上了封建朝廷的官儿以后，假面具也就摘下来了。“滴泪斩小卒”就是一幕绝妙的讽刺剧。宋江打起十足的官腔，滴着鳄鱼的眼泪，杀害了富有反抗斗争精神的起义军小校，为了表示他对朝廷的忠心，不惜拿起义军的生命当作牺牲。他一面冷酷地指斥小校“须是要连累我等”，一面虚伪地剖白自己，说什么“我自从上梁山泊以来，大小兄弟，不曾坏了一个”。前后一对照，宋江的两面派嘴脸暴露无遗，“义气”的欺骗性也暴露无遗了。

抓住《水浒》里的路线斗争，问题就容易认识清楚了。小说里的宋江被作者百般美化，大力歌颂，但他的狐狸尾巴毕竟是隐藏不住的，我们通过阶级分析，就能看清他的投降派嘴脸。《水浒》颂扬了一条反动的投降主义路线，肯定了一个丑恶的投降派人物，所以说，它是一部很好的反面教材。

〔作者附记〕一九七二年，我们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曾写了《〈水浒〉的思想和艺术》一文（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四部古典小说评论》一书中）。当时由于我们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所以没有认清《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反面教材，对投降派宋江也作了错误的评价。后来，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开始认识到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一九七三年年底，我校收到山东省利津县回乡知识青年赵安亭同志的来信，对上述文章提出了批评；同时还寄来《叛徒的颂歌》一文。校党委十分重视这封来信和这篇文章，要我们认真研究。去年春天，赵安亭同志应邀来我校做报告，促进了我们对《水浒》问题的讨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以“钟谷”为笔名，写了《从〈水浒传〉的路线斗争中吸取历史的经验》一文（原载一九七四年第二期《南开大学学报》）。这篇文章，力图从路线上对《水浒》这部反面教材进行分析和批判，但还做得很不够，这次转载时，换了题目，内容也作了一些修改。



叛徒的颂歌

山东利津县回乡知识青年 赵安亭

八百多年前，宋江等三十六人领导了山东、河北一带地区的农民起义，进行了反对宋朝统治的农民革命战争。但真宋江是个什么样的人，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而被称为“天魁星”、“及时雨”的假宋江的故事，却在人们中间流传着。系统地宣扬、歌颂这个假宋江的，就是号称中国古典文学光辉巨著的《水浒》这部书。今天，用历史唯物主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来观察一下，《水浒》中描述的宋江，并不是农民革命战争的坚强领导者，而是农民革命阵营中的叛徒。《水浒》不是满腔热情地歌颂在风浪滚滚的阶级斗争中诞生的人民英雄及其领袖人物，而是歌颂了农民起义中的叛徒；不是揭示农民起义英雄的革命品质和斗争精神，而是歪曲、丑化农民起义英雄的革命形象。这部书对宋江的描写，是对农民革命阵营中的叛徒的一支颂歌，是一种破坏、瓦解农民起义队伍的腐蚀剂。

梁山泊中的阶级阵线和两条路线斗争

梁山泊一百零八将来自各个阶级和阶层，真是五行八作、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但从其阶级成份上分析，主要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和原来曾骑在人民头上的地主官僚。

以李逵为代表的，包括三阮等一派，有农民、渔民、猎户、开店的、卖艺的、屠夫、奴仆等。他们身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和迫害，在长期阶级斗争中养成了“不怕官司不怕天”的反抗地主阶级压迫的革命精神，坚决地参加起义队伍，反对投降。他们在革命斗争中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特别是李逵，出身在一个给人家做长工的贫苦农民家庭，在他身上，表现出农民起义英雄光明正大、疾恶如



仇、英勇战斗、反抗到底的无所畏惧的英雄品质。这些人是梁山泊中基本的阶级队伍，是农民起义的真正英雄。

而善于玩弄权术的宋江，出身于州县闻名的“有钱帛使用”的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因“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做过封建官吏，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卫护士。当他杀死侍妾，刺配江州，路经梁山泊时，晁盖等人劝其入伙，他说：“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决不肯造反。在浔阳楼误题反诗，被定成死罪，梁山英雄从法场上救出他后，不得已上了梁山，但他却“身在曹营心在汉”，说什么：“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宋江是不会反对他自己的阶级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他在斗争中的表现，在几次战役中，每遇战况艰苦的时候，众兄弟拼死向前，而宋江却“撒了剑，拨回马先走”，“飞马慌忙便走”，活现出叛徒的一副“软骨头”相。

在梁山起义队伍中，还有的是长期统治人民的官吏，有的是名震一方、广有家财的大地主，有的是专门镇压人民起义的刽子手，还有的是家藏“丹书铁券”的王爷后裔。他们虽然参加了起义行列，但起义的动机与李逵等被压迫阶级是完全不同的。有因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吃了官司无处躲身，只好“暂占水泊，权时避难”的，有因进剿梁山泊而被俘虏，为了保全身家性命，将来“去邪归正”而临时投降的。他们归顺起义队伍的目的是：“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官人。”

梁山泊内部阶级阵线不同，必然出现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判断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首先应看他的政治主张和执行什么路线。

以李逵为代表的革命派，他们的政治主张是“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彻底推翻宋家王朝。在李逵这些农民起义英雄们看来，反对贪官污吏，推翻宋朝皇帝，是起义军天经地义的目标。这是一条正确的、彻底的革命路线。

以宋江为头子的投降派，却提出了一条搞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宋江出于地主阶级的本性，根本不想背叛朝廷，他的理想是“唯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死而后已”。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提出



“暂占水泊，权时避难”、“只等朝廷招安”的路线。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投降路线。

这条投降路线，贯穿于宋江在梁山泊的整个行动中。在他坐了第一把交椅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聚义厅为忠义堂。这件事在书中所费笔墨甚少，但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它意味着，宋江力图把原来是背叛朝廷的叛逆者们聚义的地方，变成大宋朝廷的忠臣良将们汇集的场所，把敢于背叛朝廷的“乱臣贼子”，变成朝廷的“忠臣”、“义士”，将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纳入忠于朝廷、为反动统治阶级利用的轨道。这一行动为后来宋江率众投降，接受朝廷招安打下了基础。

宋江提出的政治口号是“替天行道”、“忠义双全”。“天道”是什么？汉朝奉行孔孟之道的反动儒生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皇帝是“天的儿子”，是代表“天”的，皇帝实行的“王道”就是“天道”。而“王道”就是按照儒家的理论，建立起地主阶级对农民长期统治的政治秩序，是反动统治阶级欺骗劳动人民的弥天大谎。鲁迅说得好：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宋江所说的“忠义”是什么？说穿了就是只准被压迫阶级俯首帖耳地任统治阶级宰割，而不准起来革命。宋江说：“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就是他自己对“忠义”的表白。几千年来，反动统治阶级总是用“王道”、“忠义”来欺骗人民，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宋江替反动统治阶级说话，妄图用“替天行道”的口号欺骗梁山英雄，用“忠义双全”的精神枷锁把梁山英雄的手脚捆绑起来，为他搞投降制造理论根据。

中国历史上，地主阶级对待农民起义，总是采取反革命的两手策略，或者是赤裸裸的武力讨伐，血腥镇压；或者是名曰“招安”，诱其投降，以分化瓦解，逐步消灭。宋王朝也不例外。东京太师蔡京，“初意，亦欲苟且招安”。谏议大夫赵鼎上奏云：“不若降敕赦罪招安，诏取赴阙，命作良臣，以防边境之害。”宋江提出“只等招安”的投降路线，与宋王朝的策略不谋而合，完全符合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这决不是偶然的，是其阶级本性决定的。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水浒》中的宋江不是农民起义的英雄，而是一个混进起义军内部并篡夺了领导权的叛徒。



《水浒》为叛徒唱赞歌

如果《水浒》是一部描写农民革命战争的小说的话，它就应该满腔热情地歌颂以李逵为代表的真正的农民起义英雄，揭示农民起义英雄的革命品质和斗争精神，彻底地揭露、鞭挞宋江假起义、真投降的反动面目和本质。事实上却相反，《水浒》对以李逵为代表的农民起义英雄极尽歪曲、丑化、谩骂之能事，而对于宋江一伙叛徒的描写，则用尽了歌功颂德的辞藻。

《水浒》是怎样歌颂宋江等人的呢？

一、为他们树旗挂匾，给他们封上一顶辉煌的头衔，什么“及时雨”、“玉麒麟”、“入云龙”、“百胜将”等。同“黑旋风”、“活阎罗”、“母大虫”等相反，这些名贵的称号，似乎表明这些人是人间的豪杰，是天生高人一等的，是受到群众爱戴和称颂的人物，以此掩盖叛徒的真面目。

二、吹嘘他们是出身富贵，不同平凡的正派人物。他们有的是名震一方的大地主，有的是将门之后，有的是家有“丹书铁券”的贵人，有的是智勇双全的大将军，还有能“呼风唤雨”的神仙。总之，吹嘘他们都是忠臣义士，孝子贤孙，是“若得此人时，何怕官军缉捕，岂愁兵马来临”的英雄，是起义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顶梁柱，只有他们才能担当起领导起义军的重任。

三、对投降派的头子——宋江的描写，更吹捧美化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首先，说宋江是出身于财主家庭的官人，“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是个文武双全的正人君子，早就具备了领导人民，管理国家，担任起义军领袖的才能。在上山前，他就“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又好“济人贫苦，赍人之急，扶人之困”，是受苦人民的“及时雨”。“满县人见说拿得宋江，谁不爱惜他”，似乎地主官吏宋江，受到了人民广泛的爱戴。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岂有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而热爱地主和封建官吏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有着根本的利害冲突。宋江偌大一个家业的开销，和平时“仗义疏财”的银钱，都是残酷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怎么可能得到人民的



拥护和爱戴呢!

其次,吹捧宋江是完全符合“孔孟之道”的忠臣、义士、孝子。书中说宋江“以忠义为主”,“专只替天行道,誓不损害忠臣烈士,孝子贤孙,义夫节妇”。而宋江也口口声声地教训众兄弟要“忠义自守”,“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他自己处处忠于王法,就连别人要打开他颈上的行枷他也不让,说什么“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足见宋江完全是一个忠心耿耿维护地主阶级法统的奴才。

“忠”是反动奴隶主代表人物孔子提出的,并为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用来维护其统治服务的。“忠君”和“造反”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种观念。死抱着“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为臣尽忠,死而无怨”这种“忠君”思想的人,怎么能起来革命呢?宋江参加起义队伍不过是因为“官吏污滥”,“暂占水泊,权时避难”,将来仍要“尽忠报国”。请大家想一想:这样的一个宋江,能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吗?

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权总是和神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统治阶级要巩固政权,就必然求助于神权。《水浒》中的宋江,被描写成为天降人间的星宿,又有“九天玄女娘娘”的“天书”经常看习,所以成了神的代表,是有先见之明的人。梁山泊起义军所以能够取得多次战役的胜利,并不是起义英雄浴血奋战的结果,而是宋江的“天才”和“天书”指导的结果,是神的意志。信神信天的人不敢反对“天子”,这是必然的规律。《水浒》鼓吹神和“天书”的用意就是要吓唬起义的人们,没有“天书”和神的指示,是打不过官家的,“趁早投降吧”!

四、书中吹嘘宋江提出的“只等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是正确的,得到大家拥护,使四方豪杰归附。似乎梁山泊之所以兴旺发达,一百零八将之所以聚集起来,全靠执行这一路线得来的。但投降路线只能引导起义走向失败,而不会走向胜利,一百二十回本反映了这一结果。

综上所述,《水浒》这部书歌颂农民起义英雄及其正确路线是假,歌颂起义军内部的叛徒及其投降路线是真,说《水浒》对宋江的描写是一曲叛徒的颂歌,是丝毫不会冤枉它的。

毛主席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



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每一个阶级都要利用文艺塑造和歌颂本阶级理想的典型的英雄人物。《水浒》歌颂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义士、孝子，而不是歌颂农民起义英雄。《水浒》歌颂混进起义队伍中的“忠臣”宋江及其投降路线，其本意就是要把农民起义军纳入封建统治阶级的轨道，都象宋江那样做个“忠臣”，最后走上受招安的道路，为统治阶级所利用。这一点，在一百二十回本中得到了证实。在宋江投降路线支配下的梁山将领们，升官的升官，许多人都达到封妻荫子，耀祖光宗的境地，即使被打死、被害死的也得到了追封。在《水浒》作者的笔下，梁山泊农民起义的惊涛骇浪，终于风平浪静了。《水浒》为哪个阶级的政治目的服务不是很清楚吗？

《水浒》是一部很好的反面教材



《水浒》是一部有毒的书。这部书确实达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和艺术上的统一，无疑对反动统治阶级有利。因此它历来受到反动统治阶级的重视，用以大量宣传地主阶级的“忠义”观念，以期达到磨灭人民革命斗志的作用。记得旧时舞台上的宋江，总是站在舞台中央的，白脸、乌须，堂堂正正的汉子，从未听到有人说他是乱臣贼子。而真正造反的“山大王”，都是凶恶的大花脸，和宋江是不一样的。可见反动统治阶级喜欢宋江这样的“农民起义英雄”，也特别喜欢《水浒》这部书。如果我们今天说《水浒》是歌颂农民起义的，有革命性的作品，那实在是歪曲了《水浒》的本意，在九泉之下的施耐庵，定会骂我们不懂他的真意的。

元朝末年，阶级矛盾尖锐激化，农民起义如火如荼，风起云涌。元朝统治阶级风雨飘摇，预感到末日的来临，采用残酷镇压和诱降招安的两手政策，疯狂地向农民起义反扑。在这种激烈的阶级大搏斗的形势下，《水浒》的作者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恶毒地咒骂农民起义，替反动统治阶级出谋画策，抛出了《水浒》这



株大毒草。它把人民所受的疾苦说成贪官污吏不执行“孔孟之道”的结果，说什么高俅等贪官，“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说什么皇帝“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它用高官厚禄，封妻荫子，青史留名为诱饵，欺骗农民起义英雄掉转枪头去替宋王朝镇压别的农民起义军，妄想转移农民起义的大方向，把农民起义引到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受招安的邪路上去。但这样做却露了马脚，泄漏了反动统治阶级编写《水浒》的“天机”，引起革命人民对宋江式的叛徒的警惕。还是清代那个反动文人金圣叹狡猾，他腰斩《水浒》，改为七十一回本，以图达到欺骗人民、腐蚀革命的目的。

既然有毒就该废掉吗？不可。有些剧毒的东西恰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甚至腐烂不堪的东西也大有用处。如人畜粪尿，臭而且脏，若随地抛弃必将污染环境，但经过堆集发酵，却成了农民种地时不可缺少的农家肥。《水浒》唯其毒性很大，善为处之，真可成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有用的肥料。

尤其是《水浒》中描绘的宋江，与当代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有某些共同的特点。细读一下《水浒》，认清宋江这个叛徒的面目，对于我们提高识别真革命同假革命，识别真马克思主义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能力，进一步认清刘少奇、林彪一类投降主义的嘴脸，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因此，《水浒》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的一部很好的反面教材。

值得提出的是：《水浒》七十一回本写得较隐晦，宋江的叛徒嘴脸也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正象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还未彻底暴露前一样，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起着从内部破坏革命的作用。而一百二十回本中，把宋江屈膝投降，叛变革命，反回头来帮助反动统治阶级屠杀农民起义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会擦亮人民的眼睛，引起革命人民的警惕。所以封建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金圣叹腰斩《水浒》，改为七十一回本。如果我们今天也只用七十一回本，那正好称了金圣叹的心愿，他是会感激我们的。我们切不可上这个当，也应该出版一百二十回本，让革命群众看看宋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



思想评论

加强体育队伍的思想建设

郭 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伟大号召指引下，我国广大工农兵群众体育活动进一步蓬勃发展，一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培育起来的、具有新的精神面貌的体育队伍，正在迅速成长。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体育运动的普及和提高，并通过体育活动进一步发展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必须在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加强体育队伍的思想建设，把这支队伍带好。

无产阶级体育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它必须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有旧社会的痕迹。我们现在的体育领域，不可避免地还存在旧体育的痕迹。在这个领域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资产阶级体育的传统观念，都在侵袭着我们的体育队伍。因此，任何把体育看作单纯的“娱乐”，把体育阵地看作“世外桃源”，因而放松体育队伍思想建设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错误的。

修正主义体育路线反对抓体育领域两个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主张技术挂帅，技术第一。刘少奇、林彪一伙说“打球就是革命”、“拼命练就是政治”，目的就是要取消无产阶级政治对体育技术工作的统帅作用，使我们放弃体育队伍的思想建设，以便他们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广大青少年，把社会主义体育蜕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我们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但其影响还没有完全肃清，“技术第一”、锦标主义思想在体育队伍



中，在训练、竞赛等方面，还时有表现。要加强体育队伍的思想建设，就必须继续批判这种错误思想。

在体育队伍中有“一招鲜，吃遍天”之类的说法。这无非是说技术有一手，名利到处有，有了体育技术就有了一切。这种思想，对体育队伍来说，是一种腐蚀剂。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发展体育运动的目的是“增强人民体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运动员提高体育技术水平，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实现上述任务。有了这种明确的目的，运动员就肯为革命而锻炼，肯吃大苦，耐大劳，从而不断提高技术水平，这对许多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说，都是有着亲身体会的。我国登山运动员，两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都是最好的证明。相反，受了“一招鲜，吃遍天”思想的影响，为个人的名利而练，平时总是患得患失，比赛时一脑袋私心杂念，是很难取得好成绩的。急于得到“一招鲜”，结果却练不出真本领，这种例子是不不少的。退一步说，这种人即使练出了本领，如果不克服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任其膨胀下去，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也是不能“吃遍天”的。“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有“一招鲜，吃遍天”思想的人，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面前，终究是要吃败仗、跌交子的。我们的运动员是党和人民培养的，一定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立为革命而掌握技术的思想，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运动员。

“技术第一”、锦标主义，不只在运动员、教练员身上有所表现，在某些体育干部中也有反映，而且常常是干部影响群众。例如，有的同志对在比赛时拿到名次的运动员就笑脸相迎，否则就冷眼相待。运动员刻苦锻炼，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是应当祝贺的。但最好的祝贺应该是帮助他们从思想上、技术上总结经验，鼓励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同时，推广他们的经验，帮助其他运动员进步。运动员取得的成绩，获得的荣誉，都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如果用不正确的办法加以不适当的“照顾”，甚至搞物质刺激，就会使他们滋长“技术第一”和骄傲自满的思想，扩大运动员之间的差别，影响体育队伍的团结，这同真正关心运动员岂不是南辕北辙吗？我们体育战线的各级领导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划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

对体育队伍下工厂、农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需要继续提倡。技术水平的提高，不完全取决于训练时间的多少，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看人的思想觉悟高不高。实践证明，把转变运动员的思想放在首位，坚定不移地引导他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同时合理地安排训练时间，技术水平是能够迅速



提高的。运动员都是青少年，他们缺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锻炼，如果只把他们关在体育馆里和运动场上，长期脱离工农，脱离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他们就会经不起大风大浪的考验，这样的人就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同工农结合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不能把到基层表演几场，听听热烈的掌声，受到热情的招待，就当作同工农结合了。每年都要安排一定的时间，组织运动员到农村去，到工厂去，接受再教育，并辅导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我们一定要把运动队办成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学校。

毛主席指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我们批判“技术第一”，决不是不要技术。恰恰相反，批判的目的，正是要发挥无产阶级政治的威力，“抓革命，促生产”，用政治去统帅技术，为革命去掌握技术，尽快地把我国的体育运动水平搞上去。那种由于批判“技术第一”而不敢抓训练、技术的倾向是错误的。政治思想工作，不能完全离开体育业务工作去做。广大运动员最经常的工作就是锻炼、训练和比赛。他们的思想情况，很多都在这些活动中表现出来。不敢抓技术训练，政治思想工作就不能搞得生动、活泼，收到实效。我们要认真贯彻“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方针，鼓励和提倡为革命大练基本功，“对技术精益求精”。同样，批判锦标主义，也决不是不要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在比赛中，应当贯彻执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发扬力争上游、勇猛顽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作风。实际上，“技术第一”和不抓技术，表现不同，本质一样。我们肃清修正主义路线在这个问题上的影响，要结合每个单位的具体情况，抓住当时当地所表现出来的主要倾向进行批判，不能千篇一律，否则就会影响到批判的效果。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对于加强体育队伍的建设，开展体育战线反修防修的斗争，具有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我们要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密切联系体育战线的实际，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认真改造世界观。同时，继续搞好训练和竞赛的改革，从各方面进一步清除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影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体育战线出现了许多新生事物，例如工农兵评论体育、评论竞赛，实行开门训练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这些对于体育队伍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必须不断总结经验，长期坚持下去。我们要以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实际行动，来迎接即将召开的第三届全国运动会。我们相信，通过这次全运会的召开，必将把体育领域的斗、批、改大大地推进一步，把我国体育运动的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



进一步抓好农村卫生工作

韦 革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为开展卫生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发展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开辟了广阔的前程。十年来，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医疗卫生工作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重点逐步放到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城市医务人员下农村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茁壮成长，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有了显著改变。

但是，在农村卫生面貌发生了这一系列革命性变化以后，能不能说“可以放松一下”农村卫生革命了呢？不能。当前，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的推动下，进一步解决好几亿农民的防病治病问题，仍然是摆在卫生战线各级领导和广大医务工作者面前最重要的工作。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城市和农村医疗卫生条件不同，是城乡差别的表现之一。这是长期以来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和弊病。消除这种痕迹和弊病，决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一伙推行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置广大贫下中农的生老病死于不顾，妄图使医疗卫生方面的城乡差别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农村的卫生事业才出现了目前这种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但是，从逐步缩小医疗卫生方面的城乡差别的要求来看，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还只是迈出第一步，以后的任务还很多，很重。卫生工作要为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就必须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

不能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同做好城市卫生工作对立起来。城市里有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搞好城市的卫生工作，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向来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十分重视和关心的问题。城市卫生工作中有一些事，如克服资产阶级医疗作风，消除“三废”污染等，还必须花很大力气去抓。任何放松城市卫生工作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问题是，城市



的卫生工作，是否一定要通过削弱对农村的支援才能搞好呢？不是的。同农村比，城市搞好卫生工作的条件优越得多。只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进一步搞好斗、批、改，加强医务人员的思想改造，使他们牢固树立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克服资产阶级歪风邪气，限制卫生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法权，城市卫生工作是可以大力支援农村的同时搞得越来越好的。城乡卫生工作是互相影响的。有几亿人口的广大农村卫生工作上不去，城市卫生工作也必定受影响。反之，城市支援农村，农村卫生面貌迅速改观，又可以促进城市卫生工作的发展。有的同志说，“已经抓了几年农村，现在该抓抓城市了”。言外之意是，要搞好城市卫生工作，就只能放弃农村这个重点；要是重点在农村，城市卫生工作就只能放松不管。这种把搞好城市卫生工作和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截然对立起来的思想，实际上仍然是轻视农村卫生工作的表现，是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影响没有肃清的表现。

卫生工作的重点既然放在农村，那么这个重点如何抓法？近几年的经验证明，搞好农村卫生工作，决不只是简单地把人力、物力、财力投到农村的问题。城市的支援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发动农村广大人民群众自己起来办医办药。当前的中心问题是要巩固发展合作医疗制度和继续培养赤脚医生。合作医疗虽然已经办了不少，但是发展并不平衡，有些地区，特别是有些牧区和边远地区，还有空白点。有的同志强调自己那里“情况特殊”，不能办合作医疗。这主要是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力量和人民群众办医办药的积极性估计不足。只要到农村走一走，看一看，认真做点调查研究，就会发现，那里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已经有了发展，同旧社会相比，贫下中农和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办好合作医疗的基本条件是具备了。所谓“特殊”，无非是同其它地区相比，经济条件目前还差一些。但是，经济条件差，卫生条件也差，缺医少药的状况更严重一些，说明那里举办合作医疗，有着更加“特殊”的需要。经验证明，只要认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就地取材，大搞中草药，就是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社队，也完全能够办好合作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了，社员群众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就能更好地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而较快地改变落后的经济状况。如果只是坐等条件，那就是一种无所作为的懒汉思想了。

已经办起合作医疗、培养了赤脚医生的地方，还有个巩固提高的问题，有个究竟按照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題。一提到合作医疗的发展，有人总是习惯地想到城市大医院的样子。对赤脚医生，总是希望他们穿起白大褂，戴上白口罩，来个



“坐堂行医”。这其实并不是对他们的爱护。合作医疗是广大贫下中农依靠集体力量同疾病作斗争的伟大创举，它适应当前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需要。如果硬是不切实际地追求“大、洋、全”，就磨灭了它的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革命精神，这岂不就走上了邪路？赤脚医生是卫生队伍中的新生力量。他们又是农民，又是医生，打破了卫生领域过去那种当了医生就要脱离体力劳动的旧规矩，冲破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束缚。它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原因之一正在于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要逐步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这个前进的方向。如果使他们脱离农业集体生产劳动，脱离群众，这岂不是促使新生事物向旧事物看齐？赤脚医生脱离了农业集体生产劳动，就不再是赤脚医生了，慢慢就会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腐蚀，就会利用自己的医疗技术为少数人服务，为个人谋利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坚持原则，决不能倒退。

赤脚医生到底能不能做到既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又给社员群众看病治病？可以做到的。许多情况下，在劳动的过程中就可以看病。因为社员群众是小病不下“火线”的，能够到生产第一线看病，正是赤脚医生深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另外，农村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有许多是同当地的劳动条件、生活环境有密切联系的。经常参加劳动，还能找出当地防治这些疾病的具体方法来。同样的病，发生在不同人的身上，其治疗方法虽然大体相同，但也要因人而异。掌握这种差别，才能提高疗效。这只有在同社员群众长期的共同劳动中，了解了他们的身体素质和其它情况，才能做到。这样的防病治病的实践，是赤脚医生学习技术、提高技术的大课堂。广大赤脚医生只要在劳动中注意改造思想，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能够创造出许多正确处理劳动和看病关系的宝贵经验来。山西省昔阳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开展卫生革命，全县赤脚医生每年平均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二百五十天左右，防病治病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昔阳能够做到的，别的地方难道不能做到？

卫生领域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还将是长期的。在那里资产阶级影响很深，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还严重存在。我们卫生战线上的同志，要提高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就必须联系实际，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我们要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出发，弄清楚为什么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弄清楚卫生领域里哪些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如何支持它；哪些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如何战胜它。这样，我们才能坚持卫生革命的大方向，继续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



共产党员要增强党的观念

闵 雪

毛主席在讲到必须搞清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问题时说：“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我们全体共产党员，要按照毛主席这个指示自觉地检查自己，严格要求自己，用无产阶级思想作风克服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不断增强党的观念。

毛主席一贯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强调共产党员要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党性。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篇光辉著作里，毛主席曾经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非组织观点、党的观念不强和党性不纯的表现，尖锐地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领导全党开展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时，又明确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毛主席在这里所讲的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就是要求党员树立坚强的党的观念，不断增强无产阶级党性。长期以来，我们党遵循毛主席的建党思想，联系革命斗争实际，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与此相反，叛徒刘少奇、林彪则千方百计地破坏党的建设，反对党的领导，散布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反对在党的组织和党员中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其目的，是妄图从党员头脑中根本取消党的观念，削弱以至瓦解党的组织，以实现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破坏党的建设的罪行，大大提高了广大党员和干部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促进了全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大团结，广大党员党的观念不断增强，各



级党组织战斗力日益提高。我们党正在朝气蓬勃地领导全国人民为完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而奋勇前进。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为了实现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头等任务，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在各条战线和各项事业中的领导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同时，必须教育广大党员增强党的观念，使全党同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统一思想，严格纪律，整齐步调，更好地带领广大群众去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增强党的观念，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增强执行党的路线的观念，不断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历史经验证明：党的建设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党中央在社会主义时期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所作出的重要决定和指示，都是根据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和一定阶段革命任务的需要，也是为了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任务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我国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而提出来的。按照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我们党就能始终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前进，各项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就能胜利完成，无产阶级专政就能不断巩固，党的建设也能不断加强。反之，如果离开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执行不坚决，甚至歪曲篡改，阳奉阴违，必然会给党的事业带来危害，党的建设也会受到削弱和破坏。所以，看一个党员党的观念强还是不强，党性纯还是不纯，首先要看他对待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指示的态度如何。我们一定要严格遵照**“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在思想上把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增强党的观念统一起来。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作指导，不断增强执行党的路线的自觉性，加强组织观念，遵守党的纪律，保证我们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心目中没有党的组织，行动上不服从党的纪律的人，不但不能执行党的正确路线，而且难免要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翻筋斗。

毛主席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



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实践毛主席的这一指示，真正树立党和人民的利益、全局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是增强党的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作风侵蚀的根本途径。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和建党宗旨，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和最高愿望。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从入党的第一天起，就必须懂得：他不是自己个人利益的代表者，不是某一派别或小集团利益的代表者，而应是为党和人民利益献身的无产阶级先进战士。无论他在哪个工作岗位上担负什么职务，都是党派他去的，他只有完全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指示的义务，绝对没有离开党的指示自己另搞一套的权利。他应该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办事情，想问题，都必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使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几十年来，在党的教育下，我们的绝大多数党员正是这样做了，因而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越来越高。今天，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我们更需要这样去做。如果从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出发，为了迎合自己周围一部分群众的不正确思想和情绪，不顾党的全局利益，凡是符合个人利益和自己小团体利益的事情，就劲头十足去干，否则，就消极抵制，甚至公开反对，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要求。小团体主义，表面上看来似乎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它在党内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是在必须克服之列的。列宁说过：“党是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任务决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情绪，而是引导群众前进。”参加无产阶级先锋队行列的每一个共产党员，决不应该把自己降到一般群众的水平，迁就一部分群众不正确的要求，而是要用党的思想和政策去统一群众的行动，把群众提高到党的政策的水平，带领群众为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

是否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否具有坚强的党的组织观念，这是衡量一个党员党的观念强不强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列宁也指出：“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它在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我们每个党员务必懂得服从党的组织的重要性，自觉地把个人置于党组织之中，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离开了党，离开了组织，不



管一个人的能力有多大，在革命斗争中也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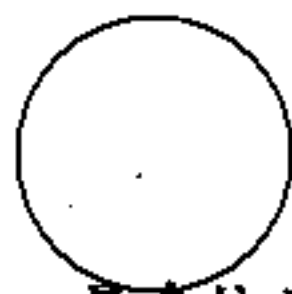
根据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党必须服从统一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是共产党员党的观念和党性强的表现。各地方、各部门党的组织以及党员个人，首先要从高度的党的观念和全局出发，服从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指示。党员个人或党的下级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党组织和上级党委作出的、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决定或指示。任何否定党组织领导的无组织无纪律的倾向，闹资产阶级派性，只能危害党的团结，削弱党的战斗力，必须坚决反对。毛主席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曾经深刻地批判了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倾向，指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使广大党员充分认识它只会“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其次，在组织上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包括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拿出办法；上级机关要了解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要慎重，一经决定，就须坚决执行；党的决议要向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传达；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要作出执行上级机关指示的决议等。我们要坚决地按照毛主席指出的这几条办，以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保持党内上级与下级、个人与组织、同志与同志之间的正确关系，使党更加有战斗力。

增强党的观念、加强无产阶级党性的过程，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过程。因而，它就不可能是和平地自发地进行，只能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来实现。放松党内的思想斗争，放松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势必给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队伍造成有利条件。在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我们要对党员认真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教育，进行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教育，不断地同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包括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旧的传统和习惯，同一切削弱党的观念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坚决斗争。每个共产党员，无论是入党时间较长的老党员，还是入党不久的新党员，都要自觉改造世界观，“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武装自己，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增强党的观念，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努力做一个优秀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坚 持 精 兵 简 政

兰 文



精兵简政，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就向全党提出：要“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又多次强调要精兵简政，改革国家机关，建立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许多部门、单位认真进行了精简，打破了重叠的机构，大批干部深入实际，加强基层领导，或者轮流到五·七干校进行锻炼，或者到群众中去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这对于领导机关和干部的革命化，对于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现在，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进一步做好精兵简政的工作。有些部门、单位，仍然不同程度存在机构庞大、人浮于事，领导班子人员过多，非生产开支过大等现象，机构显得有些臃肿。因此，我们要通过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续执行精兵简政这一重要政策。

实行精兵简政，是反修防修的一项重要措施。我们的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代表人民利益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我们的一切革命工作，都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来进行的。同剥削阶级那种统治、压迫劳动人民的官僚机构相反，我们的机关应该是很精干的，密切联系群众的，革命化、战斗化的。我们要以尽可能少的人办更多的事。这样，工作固然要紧张一些，艰苦一些，但是，紧张的工作可以使我们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艰苦的斗争能够冲刷我们身上的官僚主义灰尘。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则是造成脱离群众，滋长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的一个重要条件。有少数领导班子之所以软弱松散，缺乏战斗力，少数同志之所以小病大养，无病呻吟，从根本上来说是个路线问题，世界观的问题，但同这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也是分不开的。

实行精兵简政，可以节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我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我们要做极大的努力，要节省一切不必要的非生产性开支，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同时要加强基层单位的领导，充实生产第一线的力量。进一步搞好精兵简政，可以使我们的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各级领导机关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

实行精兵简政，有利于加强战备。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曾经科学地分析了精兵简政与战胜敌人、夺取胜利的辩证关系，明确指出，维持庞大的机构，一身臃肿，头重脚轻，不利于作战；实行精兵简政，“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又指出：“兵贵精不贵多，仍是今后建军原则之一。”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对于我们今天的工作，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实行精兵简政，也有利于培养和锻炼干部。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环境中，许多干部浮在上面，很容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沾染疲塌、拖拉、懒散的作风，不利于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精简之后，广大干部能够在实际斗争中更好地增长才干，锻炼成长。这对于造就一支强大的干部队伍大有好处。

把某些庞大臃肿的机构精简下来，使一部分干部充实基层，走上生产第一线，这是一场革命，一定会遇到旧思想、旧习惯势力的阻碍。要搞好精兵简政，必须破除各种思想障碍，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各种错误思想。

我们要批判所谓“人多好办事”的形而上学观点。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有些部门确实需要增加一些人，这是应该的。就是这种情况，也要强调精简的原则，而不是人越多越好。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是领导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指挥部，不是摆架子的。我们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当官做老



爷的。机关工作一定要讲质量，讲效率，讲多快好省，决不能不问需要与否，盲目地摆设许多人，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从事实上看，人多并不一定好办事。机关人多，往往人浮于事，不利于提高工作效能；部门多，分工过细，不利于集中统一；官僚主义、事务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烦琐哲学等不良作风也容易滋长起来。有的单位领导班子搞得过大，结果意见不易统一，甚至互相扯皮，对一些事情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这样，事情不是好办了，而是难办了。还应该看到，人多了，机关本身增加了许多矛盾，领导容易陷入事务圈子，影响抓大事、抓路线，影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要做好工作，最根本的是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用正确路线去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只要群众的积极性，包括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了，人少也能多办事，把事情办好。

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许多干部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发扬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自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抵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侵蚀，争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人民解放军的许多复员转业的干部战士，主动要求不住城市去农村，不在内地到边疆。这都充分表现了革命者的无产阶级本色，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但是，也有的同志怕艰苦，对于到基层去、到生产第一线去存在畏难情绪。这就不革命者应有的态度。一个革命者，应该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随时随地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需要。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能东能西，能城能乡，越是困难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到基层去，到生产第一线去，是我们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通过参加实际斗争，可以密切同群众的联系，从群众中吸取政治营养，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可以调查了解许多新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取得革命斗争的新经验；可以锻炼我们的革命意志，增强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加速世界观的改造。基层单位，生产第一线，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革命的熔炉，一切革命同志，都应该满腔热情地到那里去，经受锻炼和考验。

作为一个革命者，应该有为人民艰苦创业的志气，为祖国奋发图强的抱负。



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总是通过艰苦的斗争取得的。没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在一片荒原上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就没有今天的大庆；没有广大贫下中农在荒山秃岭上进行的改天换地的战斗，就没有今天的大寨。为了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全国人民正在发扬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让大庆之花、大寨之花开遍全国的各个角落。这是一个伟大的无比壮丽的事业。我们要胸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积极投入艰苦创业的斗争中去，为革命做出有益的贡献。

为了搞好精兵简政，需要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毛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论述，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林彪反党集团诬蔑干部下放是“变相失业”，反对干部深入基层，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并以“高官”、“厚禄”、“重权”为诱饵，拉拢腐蚀干部，妄图把我们的干部引向修正主义的邪路。林彪反党集团早已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它的流毒还需要进一步肃清。我们要通过学习和批判，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充分认识精兵简政的重要性，排除干扰，克服阻力，坚定不移地走精兵简政的道路。

在精兵简政过程中，我们要认真贯彻安定团结的方针，按照党的干部政策办事。要讲路线，讲团结，顾大局，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我们的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精兵简政，既要精干现有的领导班子，又要对干部进行妥善的分配和安置，使他们各得其所，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道上继续前进。我们要把精兵简政同改进领导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振作革命精神，克服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提倡领导亲自动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切实搞好各级领导机关的革命化。这样，才能“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



学习理论 反修防修

掌握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

燕 枫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指出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斗争中，认真看书学习，掌握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按照客观事物本来的辩证法办事，我们就能取得主动权。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没有什么事物不包含着矛盾。没有矛盾，就不成其为事物，当然更谈不上事物的发展了。我们观察任何事物，都要看到互相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研究它们是怎样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是怎样彼此进行着斗争，怎样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如果只看到一面，看不到另一面，忽视了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就会犯形而上学和唯心论的错误。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矛盾。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对社会主义社会作了深刻而又具体的分析。毛主席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一方面，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东西，新事物中还有旧的残余。两种互相对立的因素



同时存在，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进行着斗争。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有步骤地发展共产主义因素，而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了把历史拉向后退，则拚命地维护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这种情况贯穿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列宁曾经指出：“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发展时期。所谓“没有资产阶级”，并不是说资产阶级分子已经不存在了，而是说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成了国家的主人。所谓“资产阶级国家”，也不是说它和原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国家没有本质区别，而是说对资产阶级法权还不能完全取消，在某些方面还允许其合法存在，还受到国家保护，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是它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根本不同之点，但是，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和痕迹，因而它们之间也并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在我们党内，也存在互相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即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党发生过十次大的路线斗争，其中发生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有四次。我们党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的斗争，都是国内国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一个一个地跳出来，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在国内有他们的社会基础，在国际也都有一定的背景。总之，是由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由于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所以在党内也就必然长期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将来阶级消灭了，到了共产主义了，由于仍然存在着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有互相对立的两种因素，因此，反映这些矛盾的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会存在。毛主席在一九七一年曾经说过：



“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这个教导，对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有充分的认识。

客观事物中互相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不是僵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共产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无产阶级是朝气蓬勃的革命阶级，它在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将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向着共产主义的目标前进。这是主要的方面，起着主导的作用。资产阶级虽然日益走向衰亡，但也不甘心于失败，总是要一次又一次地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除了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以外，还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的痕迹，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他们千方百计地腐蚀我们的革命队伍，并在我们党内和国家机关内寻找代理人，妄图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在我们面前，仍然存在着两种可能性：向前发展到共产主义，向后倒退到资本主义。早在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就向全党敲起警钟：如果忘记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不能说最后的胜利。现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在继续。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再一次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我们国家，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我们对此决不可掉以轻心。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我们的社会向前进还是向后退，取决于一定的条件。“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这个条件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党的路线。“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正确，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任何时候都坚持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发展，就会前进。否则，路线错了，对资产阶级法权不加限制，甚至肆意扩大，听凭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倒退。我们坚信有可能防止和避免



苏联那样的复辟倒退，就是因为我们有毛主席所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路线正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它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任何事物中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和斗争，不管经过怎样的曲折和反复，新的方面终究会取得支配地位，战胜旧的方面。对于新生事物来说，遭受挫折是暂时的，其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壮大，并最终取代旧事物。从社会主义社会的长过程看，前进总是它的主流和本质，而倒退只不过是它的漩涡，是暂时的现象。苏联资本主义的复辟，只能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丝毫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了颜色，但可以肯定地说，经过尖锐曲折的阶级斗争，它终究还要回到列宁的道路上来。毛主席曾经指出：“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毛主席在谈到我国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总是要失败的时候说过：“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这些论断，揭示了共产主义必然要战胜资本主义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总而言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将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们能够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问题，敢于承认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期性，不回避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尖锐的问题，并且敢于公开见诸报章向全国和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进行宣传，正是我们有力量和对前途充满信心的表现，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态度。一切修正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是不可能这样做的。为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们一定**“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防止思想僵化和脱离实际，力求避免片面性和主观主义。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革命者，既要看到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更要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最终取得胜利的必然性；既不要因为前途光明而看不到斗争的艰难曲折，也不要因为斗争的长期和曲折而丢掉信心，做半截子革命派。革命导师列宁早就坚定地指出：“共产党人应当知道，未来无论如何是属于他们的”。让我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努力奋斗吧！



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法权

——学习《国家与革命》第五章

钟 实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斗争中，写下的一部系统地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光辉著作。在这部著作的第五章，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共产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及其实质，并且着重阐明了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认真学习列宁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搞清楚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正确理解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提高反修防修的自觉性，是有现实意义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个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开始提出来了。后来，他们总结了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法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经验，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来代替它。一八七五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考察了资本主义即将崩溃和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第一次提出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理论，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这样，就彻底地粉碎了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所制造的奇谈怪论，形成了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五章，集中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



理论，并且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法权之间的辩证关系。列宁指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消费品的分配“除了‘资产阶级法权’以外，没有其他规范。所以在这个范围内，还需要有国家来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资产阶级法权，是在平等的口号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奴隶制度、封建制度一样，都是以人剥削人为基础的不平等的制度，在这一点上它们是相同的。不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给这种不平等披上了一件平等的外衣。这个特点，是由在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商品经济产生的。商品经济的规律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商品生产者按照价值进行交换。这看起来权利是平等的，但是，由于他们的生产条件不同，生产商品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不一样，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在劳动市场上，工人出卖劳动力，资本家按照劳动力的价值购买劳动力，表面上也是平等的。实际上，资本家能够购买劳动力是因为他占有生产资料；工人出卖劳动力是因为他一无所有。工人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必须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受资本家的剥削。表面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资产阶级宣扬什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都是维护这种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的。

资产阶级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提出平等口号，是为了用它来反对封建特权，建立新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正如恩格斯所说：“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是用一种不平等代替了另一种不平等，它“虽然名义上承认公平原则，但是事实上时时刻刻都在肆无忌惮地抛弃公平原则”。这正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质。

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它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基本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崭新的社会制度比以往的社会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但是，它又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在经济、道德和精神各方面，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拿按劳分配来说，它是对资本主义分配原则的否定。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工人最多只能获得劳动力的价值，



而且由于大量失业人口存在，他们的工资还经常降到劳动力价值以下。资本家积累的资本越多，劳动者就越贫困。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所有制变更了，工人成了国家的主人，劳动力已经不再是商品。第一次有可能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和“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社会主义原则。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按劳动分配产品，这里通行的仍然是商品等价物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相交换。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以劳动作为尺度领取消费品，这是一种平等权利。但是，这种平等权利仍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正如列宁所说，它“**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由于每一个劳动者在体力或智力上不完全相同，获得的产品的数量并不一样，而要获得等量产品，他们在事实上却要付出不等量的劳动；同时，由于赡养的人口多少的不同，即使领取的消费品数量相等，事实上也还有富裕程度的差别。所以，这种“**‘平等权利’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平**”。从这方面来看，按劳分配“**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当马克思论述社会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他是从这样的设想出发的：第一，生产资料已经全部归社会所有；第二，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已经消亡。当时，也只能作这样的设想。因为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后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社会还不能一下子把所有的生产资料收归社会所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会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公有制，并且还会存在个体所有制的残余。与此相适应，商品制度、货币交换也不可能很快取消。因此，我国现阶段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比起《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中所说的情况来，要广泛一些。在所有制方面，我们不仅要承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差别，而且要承认集体所有制内部（公社和公社、大队和大队、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差别，承认某些个体所有制残余的存在。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在某些人中间还会出现贮藏货币、发财致富，甚至变货币为资本的动机和行为。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新老资产阶级分子，总想竭力维护和扩大这种不平等，去追求个人的私利，以致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果实。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



土壤和条件。

正是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情况出发,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说:“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并且进一步明确地说:“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维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它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完全相反,为什么又说它还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呢?列宁在回答这种疑问时指出,“其实,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一小块‘资产阶级’法权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列宁在这里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不过是新事物中的旧的残余,是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还要保卫这种劳动平等和产品分配平等的权利。正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还要保留资产阶级法权,从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说,它还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保留资产阶级法权,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目的根本不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既要保留资产阶级法权,又要限制它,而且要创造条件最后消灭它。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可以使我们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由于我们现在还要保留资产阶级法权,就会出现两种可能:一种是允许资产阶级法权存在,但要逐步缩小实际上存在的不平等,创造条件最后消灭这种不平等,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一种是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扩大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培育资产阶级分子,使他们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就是在“全民国家”的



口号下，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工具。这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

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又是革命发展阶段论者，既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去勉强做那些现在还做不到的事情，又不能忘记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决不能以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社会主义社会，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平等的王国，把它凝固化，把资产阶级法权永久保留下去，甚至加以扩大。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既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承认某些方面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的制度，又要根据客观条件的发展对它加以限制，并且积极创造条件逐步缩小它，“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事实上的平等”。我们党采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系列重大措施，都是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例如，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坚持毛主席亲自制定的“鞍钢宪法”，使企业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在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壮大社队经济，逐步缩小社与社、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走五七道路，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分配方面，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逐步缩小个人收入差别，等等，都应当坚持下去。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有一个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过程，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因素有一个由量的减少到质的消亡过程。如果认不清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质，就会迷惑于平等的口号，看不见各个领域还程度不同地保留着不平等的制度，对它不加限制，任其扩大，就会增加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今天世界上，“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只要我们加强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就一定能够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完成反修防修、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历史任务。当全世界都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地提高了，“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会完全消亡了。”



总结经验 促进学习

李 扬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为了“搞清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坚持理论和实际结合，不断把学习引向深入。有些地方，结合理论学习，认真回顾和总结本地区、本单位解放以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加深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认识，提高了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也是理论联系实际，促进学习深入的一个方面。

解放以来，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战线上进行了一系列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各地区、各单位在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践，不同程度地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例如，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的经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经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经验，加强党的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的经验，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教育的经验，以及抓革命、促生产的经验，等等。认真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搞清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是不是认真总结我们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历史经验，这对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好各项工作，很有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工作做过了，可是对工作中的经验不重视，不善于总结，做对了的讲不出什么道理，做错了的也不知道为什么错，因而行动上盲目的；另一种态度是对以往的经验能认真总结，经常看看自己是在怎样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经受教育和锻炼的，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又有哪些错误的教训，通过总结，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自觉地去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好工作。有的同志所以不断犯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善于总结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有的同志所以能够工作得比较好，与他善于总结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分不开的。对于我们工作中的经验，在没有对它加以总结之前，它还只是一些感性的东西，我们对它的认识是不完全



的；而对这些感性东西进行科学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上升到理论，就可以使我们的思想大大提高一步。正因为如此，毛主席非常重视总结经验。毛主席说：“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成功的经验，通过总结可以进一步提高认识，加深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理解，使这些经验得到更好的发挥。错误的教训，通过总结能使我们认识到犯错误的原因，化消极的东西为积极的东西，使自己更加努力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因此，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错误的教训，对我们学习理论，搞好工作，都是宝贵的借鉴。

毛主席说：“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我们不管搞什么工作，都是在实行政策，不是执行正确的政策，就是执行错误的政策。我们工作中的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经验。认真总结本地区、本单位实行政策的历史经验，对我们了解党的方针、政策的实质，知道现在应该怎样去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很有好处。我们党不仅制定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而且为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制定了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比如，我国实行的是商品制度，但必须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农村可以有少量家庭副业，但不能利用家庭副业发展资本主义倾向；在工厂必须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反对利润挂帅的资本主义办企业路线，等等。这些方针、政策都是根据党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客观实际制定出来的。这些方针、政策在斗争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也在斗争中不断为广大干部、群众所认识和贯彻执行。刘少奇、林彪一类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总是千方百计干扰和破坏党的方针、政策。我们有的同志在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有时就分不清政策问题上的是非界限，左右摇摆，给工作造成被动局面。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照自己以往实行政策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可以使我们知道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当怎样去做，反对任何偏离党的方针、政策的作法。在当前的学习运动中，我们要把学习理论同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结合起来，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切实地做好我们的工作。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开展以来，广大干部和群众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取得了不少新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促进理论学习不断深入，也是我们领导学习运动时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工人阶级也要不断学习和改造

洪 滨

努力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全国人民当前的首要任务。我们工人阶级更应该认真学好。工人阶级只有学懂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才能深刻地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在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充分发挥领导阶级的作用。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革命阶级。毛主席指出：“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作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物，无产阶级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因此，它有着其他阶级所不能具备的许多特点，如大公无私，最有远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最有组织性、纪律性。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特点，决定了它是革命事业的领导阶级。中国工人阶级是通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实现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领导的。工人阶级不仅要团结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并剥夺其生产资料，镇压他们的反抗，而且要改造和教育小生产者，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还要努力创造条件，逐步缩小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直到消灭三大差别，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消灭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十分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要求我们工人阶级必须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地“同劳动者身上也有的、经常拖无产阶级后腿的一切弱点和缺陷进行斗争”。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它为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是工人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以这个理论为基础的。我们工人阶级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才能够在自己的先锋队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自己，团结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团结知识分子，团结一切革命的人民**”，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分子，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样，工人阶级才能最后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关于工人阶级的学习和改造，毛主席作过一系列重要的论述和指示。早在一九三七年，毛主席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一九四九年，在我国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时刻，毛主席深刻地教育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一九五七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在强调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时再次指出：“**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对于毛主席的这些谆谆教导，我们工人阶级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应当反复学习，不断实践。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工人阶级的学习和改造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骄傲起来。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按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还是按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这种矛



盾和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工人阶级内部来。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种情况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列宁说过：“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还保存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的新人，他还站在旧世界的污泥里面。”剥削阶级的思想作风，小生产者的思想作风，以及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世界观，都会通过各种渠道侵蚀工人阶级队伍。工人阶级总是要不断吸收其他阶级的成员参加自己的阶级队伍，这样就必然把其他阶级的思想带进工人阶级队伍。改造自己阶级队伍成员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是无产阶级的一项重要任务。这种状况说明，在工人阶级内部发生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甚至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毫不奇怪的，同时还说明工人阶级也需要不断学习和改造。

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还保留着从旧社会带来的痕迹，“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这是产生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资产阶级腐蚀和无产阶级反腐蚀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的。列宁曾经指出：“资本主义有意要分化工人，以便使工人阶级中一小撮上层分子同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资产阶级利用金钱腐蚀、物质引诱的方式，收买工人贵族，培养工贼，作为他们剥削压榨工人阶级、维护资本主义罪恶统治的一种手段。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老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名声已经很臭了，从工人中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来同工人阶级进行斗争，比他们亲自出马更为有利。因此，他们更加注重采用拉出去、打进来的手法，从工人阶级中收买、培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以便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刘少奇、林彪一类拚命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妄图在资产阶级法权的温床上培养出新的工人贵族，以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中某些不注意



学习和改造的不坚定分子，就有可能沾染旧世界的污泥，甚至掉进资本主义的泥坑。

毛主席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工人阶级要胜利地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抵制资产阶级的腐蚀和侵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努力学习和改造。同样是工人阶级的成员，为什么许多人能面对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巍然屹立，越战越坚强，而有人在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面前，晕头转向，发生了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关键就在于有没有学习和改造的自觉性。我们有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同资产阶级作各种形式的斗争的丰富经验。这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优胜条件。只要坚持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自觉地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就能够有效地抵制资产阶级的腐蚀，防止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一旦产生出来，就能及时识破他们，并坚决与之斗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不断纯洁自己的队伍，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许多青年工人学习和改造是很努力的，历次运动中都有一批青年工人成为学习和斗争的积极分子，但也有的青年工人往往不大注意学习和改造。这些同志不了解革命胜利得来之不易，不了解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他们认为自己出身好，可以“自来红”。这种想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出身好，只是学好马列主义理论、改造世界观的一个有利条件。但是如果把它当作包袱背起来，以此作为放松学习和改造的理由，那就会走向反面。地主资产阶级的教唆犯，往往利用一些青年工人的这种弱点，以物质引诱、思想腐蚀为手段，企图把他们拉下水去。林彪一类不就是这样干的吗？好脑袋是“爹妈给的”这种谬论，正是林彪一类用来骗人的鬼话，革命青年决不要上当。世界上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有什么“自来红”。不注意学习和改造，决不能自发地产生无产阶级的思想，相反地，倒是可能“自发地”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甚至逐渐演变成新资产阶级分子。进了工厂，并不等于进了红色保险箱，穿



上工人服装，并不等于具备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和优秀品质。先进思想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而是在不断地学习马列主义和不断地参加变革现实的斗争中获得的。各级党的组织，共青团和工会，都应当把对青年工人的教育当作一件大事，把它抓紧、抓好。

加强学习和改造，对老工人也同样是必要的。老工人在旧社会深受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对旧社会的人间地狱有深仇大恨。解放后，翻了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对党对社会主义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们积累了比较丰富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经验。但是，决不能以此为满足，还必须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改造世界观，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只有把朴素的阶级感情提到路线觉悟的高度，把感性的经验上升到理性的认识，同各种旧的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老工人还担负着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任，路线觉悟的高低，思想作风的好坏，对青年工人影响很大。如果自己学习不好，又怎么会有好的思想作风去培养、教育工人阶级的后代呢？那种以为“船到码头车到站”，“该歇歇脚、松口气、享享福了”的思想，就是剥削阶级的旧思想侵蚀我们工人队伍的一种反映，坚持继续革命的老工人应当坚决抵制它、批判它，同它划清界限。许多老工人讲得好：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要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毛主席说：“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为革命而学习，为革命而改造，贵在自觉，持之以恒，决不能中途停顿，更不能倒退。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思想不断跟上发展变化着的客观情况，不致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世界的未来是属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终究要战胜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要在全世界实现。这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工人同志们，紧紧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朝着这个远大目标前进吧！



深入学习理论必须端正学风

中国共产党盘锦地区委员会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以来，我们地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广大干部通过认真读书，刻苦钻研，对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旧社会的“痕迹”、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必要性、对改造小生产的长期性等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进一步提高了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今年，我们地区虽然遭受地震和洪水两次严重的自然灾害，但在毛主席重要指示的光辉照耀下，广大干部和群众团结战斗，各项工作都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新气象。

毛主席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回顾我们地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发展过程，我们体会到，把学习不断引向深入的关键在于端正学风，坚持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原则。长期以来，有的同志在理论和实际的关系问题上，总是处理得不那么正确，他们或者不重视理论学习，或者学了理论不去应用。在这次学习运动中，这两种毛病也经常表现出来，需要不断地加以克服，而且不是强调一、两次就可以解决的。我们正是由于注意解决这个问题，既提倡认真看书学习，又强调把学到的理论运用到实际中去，才使学习运动能够逐步深入，取得一些成效。实践证明，把学习引向深入的过程，也就是促进理论和实际不断结合的过程。

提高学习的自觉性，是搞好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使学习不断深入的前提。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发表，激发了广大干部的学习热情。可是，也有少数同志对这次学习理论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认识不足，说什么“我们同地、富、反、坏、右斗了多少年，天天搞无产阶级专政，不学也离不开大格”。因此，他们对学习就不够自觉，总是推一推，动一动，常常落后于群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举办了领导干部学习班，反复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着重讨论为什么“**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许多同志联系苏联修正主义上台的历史教训，总结同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经验，深切



地认识到，我们不仅要认清被打倒的阶级敌人时刻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坚持同地、富、反、坏、右斗，而且要认清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土壤和条件，坚持同修正主义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斗。搞社会主义，就是搞无产阶级专政。离开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实际工作中就会违背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认识提高后，学习的自觉性就增强了。过去，有的同志学习《国家与革命》年年开个头，几年都没有读到尾。这次，一连学习了好几遍，并且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写了一些心得。

对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还表现在学习中不能抓住重点，领会精神实质。有的同志往往在一些名词、概念上兜圈子，钻牛角尖，或者对某些具体经济政策和制度方面的问题争论不休。这样的学习，表面上看热热闹闹，实际上是不入门，还不懂得这次学习要搞清楚和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为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切实领会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精神实质，我们反复强调学习的重点要紧紧围绕着“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中心问题，着重弄清楚：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为什么小生产经常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为什么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修正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对这些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要求达到正确的透彻的理解。我们地区许多单位的领导班子，由于抓住了重点，学习就有了一定的深度，能够运用理论比较正确地分析和解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些现实问题。

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光坐在屋子里读书还不够，还必须抓住调查研究这个促进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重要环节。我们有的同志自认为在基层工作多年，闭上眼睛也能琢磨个八、九不离十；还有的同志虽然也下去跑一跑，了解到一些情况，但只是罗列一堆现象，不愿做系统的分析和深入的研究。我们考虑到，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提高大家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的认识；另一方面地委一班人要以身作则，深入基层。我们决定地委常委都分别深入到工厂、农村、街道、机关、学校中去，围绕着学习重点，进行专题调查研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就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教育和改造小生产、加强对集市贸易的管理、抵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扶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加强党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调查，并写出了一批调查报告。毛主席说：“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过去，我们只知道一些党员犯错误，但对他们犯错误的社会根源和



阶级根源理解不深。这次，我们通过对新屯大队党员状况的调查，对党员一部分中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以及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个大队土改以来，党员队伍不断扩大，其中多数朝气蓬勃，发挥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作用，也有部分党员不同程度地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个别的甚至蜕化变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着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有的人不注意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克服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受到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腐蚀，就很容易被“糖衣炮弹”打中。通过这样的调查，我们不仅加深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理解，而且明确了进行党的建设方向。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武装广大党员的头脑，提高他们的反修防修的自觉性，才能有效地防止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做到拒腐蚀，永不沾，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调查和不调查大不一样。调查研究搞得越深入，对理论问题的理解就越透彻，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就越有把握。要使学习运动不断深入，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对实际情况的调查和分析。

在把学习不断引向深入的过程中，我们还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不要联系解决本地区、本单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问题？对这个问题，多数同志的回答虽然是肯定的，但做起来就不一样了。在理论上没有搞清楚，对实际情况又不甚了解，就草率从事，动手解决问题，必然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妨碍学习的深入。但是，从我们地区来看，影响学习深入的主要问题，还是学了理论不去应用，口头上说的是一套，行动上做的又是一套。当然，解决实际问题也要抓住重点。路线是根本，领导是关键。我们强调重点是解决各级领导班子的方向路线问题，因为这关系到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关系到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我们对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克服资产阶级派性、抵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等方面的问题，要求在学习中逐步解决，解决得越彻底越好。从我们地区的情况看，有的同志对解决实际问题不那么主动，主要是“怕”字作怪。解决团结问题怕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怕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抵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怕得罪人，有少数自己身上不干净的人还怕牵连自己。因此，我们在学习中启发这些同志去掉“怕”字，换上“敢”字。我们地区是新开发的地区，干部来自四面八方。过去，由于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在新干部和老干部、本地干部和外地干部、这部分干部和那部分干部之间，都存在一些不够团结的现象。我们强调要建立一



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大家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批判资产阶级派性，讲路线，讲全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促进了安定团结，发展了我们地区的大好形势。

经过半年多的学习，大多数同志的理论水平都有一定的提高。这时，有的同志觉得，书读了一些，调查研究搞了一点，有的问题也解决了，学得“差不多”了。这种满足现状的思想，是影响学习深入的一个障碍。我们及时召开县以上的领导干部会，分析了学习形势，引导大家正确地认识我们学习理论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仅仅是个开始，学习是永远没有止境的。例如，我们对于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等问题，有了一些认识，可是，还很不系统，很不深刻。要真正搞清楚这些问题，还必须作长期的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了使学习继续深入下去，我们举办了县以上领导干部的政治经济学读书班，选学了《资本论》的有关章节。有的同志原来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制度、货币交换为什么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在理论上讲不清楚。学习政治经济学以后，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一方面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在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腐蚀下，有人就会利用各种合法和非法的途径，占有大量的商品和货币，甚至将它们转化为资本。对商品制度、货币交换的这种消极作用，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我们通过这段比较系统的理论学习，更加深切地感到，学习马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既是一项迫切的任务，又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如果浅尝辄止，学到一点就满足起来，就不可能持之以恒，学到更多的东西。有的同志说得好：“学习理论也要有登山队那样的精神，不怕任何困难，克服重重障碍，不断攀登高峰。”

我们感到学风是否端正，不是一般的学习方法问题，而是党风问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只有把学风端正了，才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有效地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最近，我们地区的广大干部正在重温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期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学习和时局》等光辉著作，克服学习理论中的不正之风。我们决心以毛主席的这些光辉著作作为指针，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逐步引向深入，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翻身农奴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

——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

朱 锋

一九七五年九月九日，是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纪念日。西藏各族人民满怀胜利的喜悦欢庆这个节日。

一九五一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驱逐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实现了祖国大陆的统一。一九五九年平息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以后，百万农奴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推翻了封建农奴制度，变封建农奴主所有制为农(牧)民个体所有制，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一九六五年，西藏自治区光荣诞生了。

民主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西藏往何处去？是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甚至让封建农奴制度复辟？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西藏各族人民的命运和前途，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祖国边疆的巩固。西藏自治区各族人民没有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和期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群众运动的推动下，百万翻身农奴和其他劳动人民，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阔步前进，一个社会主义的新西藏正在蓬勃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十年来，西藏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象雨后春笋，茁壮成长。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进一步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而今，从三江流域到阿里台地，从藏北草原到喜马拉雅山麓，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

西藏各族人民在封建农奴制度的废墟上，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主要经验是什么呢？

首先，是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坚持开展阶级斗争，打击反动农奴主阶级的复辟势力。毛主席教导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只有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观察问题和对待问题，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社会矛盾，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基础上，我们继续对农牧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阶级斗争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西藏民主改革以后，反动农奴主阶级失去了它的统治地位，百万翻身农奴成了西藏的主人。但是，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如果不加改造，仍然有可能成为复辟资本主义、复辟封建农奴制度的经济基础。为了积极引导广大农牧民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从一九六五年开始，抓了创办人民公社的试点，并逐步推广。现在，全自治区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乡都建立了人民公社，基本完成了对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在西藏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西藏的伟大胜利。

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复杂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这个运动，比民主革命更为广泛、更为深刻。它不仅是在所有制方面，同时也是在政治、思想各方面的一次革命，是逐步铲除资本主义赖以滋生和发展的土壤的一个重大步骤。封建农奴主和城乡资本主义势力都知道，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建立以后，要搞复辟，要发展资本主义，就更困难了。所以，他们千方百计阻挠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西藏各级党组织，坚持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群众，武装群众，使广大群众认清这场斗争的实质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也是关系到能不能防止封建农奴制度复辟的问



题。翻身农奴和其他劳动群众从切身的体验中认识到，人民公社是通向彻底翻身解放的“金桥”，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踢开了种种绊脚石，奋勇走上了社会主义大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旧的上层建筑包括旧的意识形态都是为其腐朽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民主改革的胜利，推翻了反动地方政府、寺庙和贵族三大领主的统治，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受到很大的冲击。但要在这块长期受封建农奴主阶级统治的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清理旧基地的斗争仍然是十分艰巨和复杂的。千百年来，农奴主阶级总是以“天命”、“神权”作为其反动统治的精神支柱。他们把西藏最高反动统治者说成是受命于“天”来统治百万农奴的“活佛”，而把农奴受到种种骇人听闻的残害、压迫和剥削说成是“命中注定”的。反动阶级往往以此来破坏社会主义事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翻身农奴深入批判林彪、孔老二的“先验论”、“天命观”，向“天命”、“神权”宣战。他们召开各种批判会，举办阶级教育展览，运用回忆对比等多种形式，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过去一生病，寺庙、头人就要人们念经打卦，敬神送鬼，现在已初步建立了医疗卫生网，六千多名赤脚医生在防病治病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过去不敢触动“神山”、“神水”、“神土”，现在劈山引水，改土造田，向大自然宣战。为了使广大群众逐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打碎“天命”、“神权”等等精神枷锁，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广大农村和牧区创办了政治夜校、读报组、业余文艺宣传队，一支拥有三万多人的工人、贫下中农（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已经建立起来。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正在不断扩大自己的阵地。事实证明，“革命把旧地基掘得愈深，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就愈牢固。

斗争的实践还使我们深深体会到，紧紧依靠百万翻身农奴，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发展的基本保证。

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正如列宁指出的：“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百万翻身农奴是西藏各民族的主体，是



创造西藏历史的动力。没有他们的真正觉醒和英勇斗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总是归于失败？为什么社会主义事业能象雅鲁藏布江水一样奔腾向前？很重要的一条是因为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百万翻身农奴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翻身农奴在封建农奴制度下，受压迫受剥削最深，因此，对毛主席、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无比热爱。他们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伟大的真理，就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而斗争。他们是建设新西藏的依靠力量。

依靠百万翻身农奴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在他们中培养和选拔大批的民族干部。毛主席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过去的奴隶，在反动统治者的眼中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现在，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他们中的不少人已成了共产主义的战士。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革命斗争风浪的锻炼和考验，涌现出大批具有一定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的先进分子，许多人被党和群众选拔到不同的领导岗位。全自治区少数民族干部已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县、地区和自治区三级领导班子中，少数民族干部占百分之四十六。农牧区的区、人民公社的主要领导干部，基本上是少数民族干部。一大批少数民族女干部也在斗争中迅速成长起来。这些少数民族干部，为党、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不愧为西藏各民族劳动人民的好儿女，是党和西藏人民宝贵的革命财富。

十年来，西藏之所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又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执行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一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方针。

西藏是伟大祖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西藏在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等方面，一直得到国家的大力帮助和兄弟民族的热情支援，这充分体现了党对西藏人民的巨大关怀和各民族间的亲密团结。这种帮助和支援，对促进西藏革命和建设的发展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西藏的面貌，搞好西藏的革命和建设，还要靠当地群众和干部的艰苦奋斗。

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



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还是强调困难，当“伸手派”，反映了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它关系到能不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西藏在历史上长期受国内外反动派的压榨和掠夺，一穷二白，基础薄弱，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尤为重要。在领导西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西藏各级党的组织，始终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育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教育干部和群众，树立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批判懒汉懦夫世界观，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西藏各级党组织拿出很大的力量，积极领导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并且采取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方法，用心总结当地群众中的先进经验，发现和树立了列麦公社、红旗公社、加加养护段等一批先进典型。这些先进典型生动地说明，大庆精神、大寨精神已经在西藏高原上生根、开花、结果。这就使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更加深入人心，从而大大推动了全区各条战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

西藏的劳动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历史上，他们曾以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开发了西藏高原，在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过程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解放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西藏各族劳动群众同驻藏人民解放军和进藏工作的同志一道，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革命传统，克服困难，艰苦创业，在“世界屋脊”上创造了前无古人的英雄业绩，为祖国做出新的贡献。

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旧西藏的情景，看一看解放以后的发展变化。在封建农奴制度下，西藏的工业完全是一张白纸，连螺丝钉都不能制造；交通阻隔，运输全靠人背畜驮；农牧业生产处于靠天吃饭、靠天养畜的落后状态；农奴们没有生产资料，没有人身自由，过着人间地狱的悲惨生活；群众缺医少药，各种疾病猖獗；至于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那就更谈不上。解放以后，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百万农奴推翻了农奴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奔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他们无穷的创造力就迸发出来，西藏的面貌就迅速改变了。据一九七四年统计，全区已建成中小型厂矿二百五十多个，工业总产值比一九六五年增长了近三倍。粮食总产量比民主改革前的一九五八年增长一倍半，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



粮食自给。畜牧业生产战胜了严重自然灾害，牲畜头数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一点三倍。在交通运输方面，建成了以拉萨为中心，以川藏、青藏、新藏公路为干线的全区公路网，百分之九十七的县通了汽车。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提高，少数民族人口迅速增加，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取得可喜的成绩。所有这些，都证明了毛主席指出的伟大真理：“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西藏能够由封建农奴制度转变为社会主义，实现历史性的飞跃，起决定作用的，就是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领导。

毛主席、党中央历来十分关怀西藏人民，十分重视西藏的革命和建设。毛主席关于西藏问题的多次指示，及时地给西藏的革命和建设指明了方向，并且规定了具体的策略和方针。无论在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党中央总是教导我们，一定要从西藏的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慎重稳进，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去夺取胜利。实践证明，只要坚决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去做，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去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革命就发展，就前进；反之，就会犯错误，出岔子，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这是我们多年来最深切的体会，也是西藏工作中一条最根本的经验。

搞好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是加强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西藏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发展，基层干部和群众中涌现出大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分子。这就为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准备了很好的群众基础。经过整党、建党，全区农村、牧区党的基层组织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了一倍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公社建立了党的支部。全区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党员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了近三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了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西藏地处边疆，阶级斗争复杂，战略地位重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加强党、政、军、民的革命团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西藏的军民团结、军政团结、干群团结、民族团结，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有着很好的传统。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进驻西藏以来，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西藏劳动人民结成了鱼水深情。他们充分发挥了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作用，为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许多进藏工作的工人、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长期建藏，边疆为家，以苦为乐，以苦为荣，与当地群众和干部打成一片，互相尊重，亲密团结，共同战斗，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对于上层爱国人士，实行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服务。毛主席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对毛主席的这一教导，西藏各族干部和群众，体会是十分深切的。

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欢庆这个节日的时候，喜看西藏高原江山多娇，翻身农奴引吭高歌：“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翻身农奴的心儿照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这首歌曲，唱出了西藏各族人民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无限深情，表达了西藏各族人民继续革命的坚强意志。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就向全党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国各族人民的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同这个任务相比，我们所取得的胜利，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当前，西藏自治区同全国一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正在深入开展。西藏各族人民决心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学好理论，加强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更大胜利。

（本文作者系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工作人员）



依靠群众赢得了高速度

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筹建指挥部

正在建设中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又称金山工程，是一个以石油为原料，生产多种合成纤维的现代化大型联合企业。这项工程从筹建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依靠全市和全国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援，依靠工地上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工程进展很快。原来的茫茫海滩上，如今已是建筑成群，管道纵横，塔罐林立。厂区外，万吨级钢桩墩式进油码头基本竣工，铁路支线和黄浦江铁路大桥已建成通车。

金山工程建设的高速度进展，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胜利，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大搞群众运动所取得的成果。

金山工程是一个大型工程。它要求在海滩上兴建起包括炼油、裂解分离、抽丝到污水处理等十个大型工厂，以及一系列附属工程和生活设施，并要求在二、三年内建成投产。怎样才能多快好省地建设这个大规模的现代化工程？我们强调大搞群众运动，充分利用上海市原有的工业基础，调动各行各业的积极性，组织社会主义的大协作。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组织了全市工业部门、设计单位和近百家工厂分别承担各个项目的建设任务；全市的工农商学兵都动员起来，形成了一个千军万马战金山的群众运动。

依靠群众，就能产生巨大的力量，许多本来认为无法做到的事也可以做到。工程规模大，任务重，就更应该大搞群众运动。金山工程的厂址确定之后，为了避开大潮汛，要赶在冬季内完成围海造地的任务。数万贫下中农在寒风刺骨的冬天，自带工具，在短短的三十二天内，就完成了一百二十万土方，在海滩上筑成了一条长达十七里的长堤。工程建设全面开展后，来自各条战线的五万建设大军集中到工地上，用高速度拿下了一个又一个的现代化工程。制氧车间按常规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完成，现在从施工到投产总共只花了一百三十四天；建筑面积三万



四千平方米的腈纶厂北纺拉丝车间，过去建设最快也得半年，现在只花四十五天就建成了。工地现场上群众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工地之外的全市各个行业以及全国许多工厂，也在为支援金山搞得热气腾腾。单以上海来说，就有五百多家工厂为金山工程赶制设备和材料。这中间，有万人的大厂，也有里弄小厂，还有郊区的社队工厂。输油码头和黄浦江大桥的建设急需四百多根钢桩，焊接这些钢桩相当于三条万吨轮的焊接量。但上海各船厂分担任务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全部完成并送到了工地。去年七月，金山工地的设备安装进入高峰，各类物资的供应十分紧张，市清仓节约小组发动工厂、部队、学校、机关等五百多个单位，几天之内清出了价值六百多万元的物资，并派出一百六十多辆卡车，浩浩荡荡送到了金山。两年多来，金山工程建设的每一个进展，都是与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分不开的。毛主席说：“**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基本建设也是这样，越是现代化的大型工程，就越应当大搞群众运动。只有这样，才能为工程建设赢得高速度、高质量、高水平的进展。

石油化工是新兴工业，具有高温、高压、易燃、易爆、易污染等特点，工艺复杂，技术要求高，各个环节都需要严格保证质量。在这种情况下，更要依靠广大群众的高度自觉。只有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大家都重视工程质量，各项工作都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才能做到多快好省。金山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工人们提出“向大庆工人学习，精心施工，自觉从严”的口号，努力把各个方面的工作做好，保证了工程的质量。就拿焊接安装钢体球罐来说吧，这种球罐是储藏各种液化气的，大小共有三十三只。最大的有五六层楼那么高，由六十六块高强度的弧形钢板拼接而成，全部焊缝要求很严，一处焊接有问题，就会引起球罐爆炸。在国外，焊接这种球罐的工人要有六年以上的焊接工龄，还要经过特种考试。我们工地上焊接力量本来就不足，要照国外的标准选焊工就得停工。怎么办？还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攻下这个技术难关。工地上负责焊接最大一只球罐的，是只有二百多名工人的上海第二焊接厂。他们推选了三十六位同志组成了一支战斗队，其中除六名老师傅外，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工人，女青年占了一半，有些还是未满师的徒工。可是，他们满怀豪情地说：“球大，没有我们的干劲大；钢坚，没有我们的意志坚。”为了把每一条焊缝都焊好，他们刻苦钻研，开展技术练兵，许多人衣服烧破了，脸熏肿了，手上烫起了泡，但没有人



叫一声苦。在焊接过程中，有些焊缝很长，要达到质量标准，需要连续高空作业。他们就把干粮带上高空，饿了，就啃上几口，不焊好不下火线。经过一百八十多天的奋战，终于胜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质量完全符合要求。

这里，还有一个如何正确发挥技术人员作用的问题。我们体会，大搞群众运动，应当包括充分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在内，使技术人员和广大群众紧密地结合起来。要建设金山这样现代化的大型工程，需要有专门的技术知识，需要充分发挥具有某些专门知识的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尊重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但是，不论什么工作，包括一些复杂的技术问题，都要广泛发动群众，从各个方面揭露矛盾，分析矛盾，才能从实践中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金山工程中，大型设备共有三百多件，其中最重的二百多吨，最长的六十米，最大的直径六米多。如何把这些重的、长的、大的家伙运到工地来，确实困难很多。如果从公路上运，沿途十九座桥都要翻造加固，经济上不合算，时间上也来不及；从海里走，金山沿海没有码头，运不进；从内河通过驳船运，航道浅窄，桥洞低，钻不过去。怎么办？我们在市有关部门支持下，召开了交通运输系统各单位的会议，把工程的意义和困难直接同群众见了面。一发动群众，办法就有了。那些在旧社会被称为“排头”、“排花子”的扎排工人，创造性地提出了使用我国古老的运输工具——木排，解决了这个大难题。上海南市区、川沙县的一百五十多个扎排工人，在三、四天时间里，群策群力，画出了五十多种不同形状的草图，又经过分析比较，根据运输各种不同形状大型设备的要求，设计出了好几种新型的木排，终于把这些大型设备完整无损地迅速送到了工地。

技术人员只有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使理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从而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金山工程要建造一个万吨的进油码头。开始时有人认为，当地风大、浪急，潮差大，不能造码头。究竟能不能造？负责勘测、设计的交通部第三航务工程局、上海港务局、上海师范大学等单位的研究、技术人员，到陈山地区进行了三个月的现场调查，访问了很多贫下中农和老渔民，并且在台风季节和当地渔民、筑港工人一起在船上持续观察了十二个昼夜，终于摸清了陈山海域的自然状况，掌握了当地大风大浪时水文气象的变化规律，最后得出了陈山海域可以建造深水码头的结论。经过一年多的奋战，陈山码头比原计划提前一年建成，现在已经停泊油轮并开始进油了。技术人员感受很深地说：“坐在办公室



里,看到的只是小天地;和工人群众结合在一起,才是真正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大搞群众运动,必须加强领导。群众运动的规模越大,对于领导艺术和组织工作的要求越高。建设象金山工程这样的企业,只有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才能使群众运动深入持久地广泛开展下去。

金山工程的大小项目有四十六个,参加筹建、设计、施工的单位上百个,队伍来自全国各地。为此,必须统筹兼顾,合理组织,把各方面的力量拧成一股绳,形成一股劲,才能保证工程建设的高速度进行。我们对工地上的各个建设项目和各主要生产装置,都建立了筹建、施工、设计三结合的指挥小组。在物资供应方面,实行市内物资部门和工地物资部门挂钩,合署办公。这样做的结果,精简了机构,提高了效率,改变了过去那种层次多、手续繁、相互扯皮的现象。同时,我们强调各级指挥部在工程的每个阶段都要加强调查研究,做到胸中有全局,安排有重点,在每个工程的施工、安装前,做好各方面力量的组织和调配工作。同时,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工程总进度的要求和各个阶段的主攻方向,有计划、有步骤地集中优势兵力打好歼灭战。

加强领导的根本问题是加强思想领导。几万人的建设大军,要统一指挥,统一步调,统一行动,首先就得统一认识。工地上单位多、部门多。有一段时间,大家都想尽快把自己的那部分任务抢先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加强统一领导尤其重要。不然的话,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就乱了套了。我们在组织群众搞大会战的过程中,组织大家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积极引导大家发扬“想全局、急全局、为全局”的共产主义风格,抵制和克服形形色色的本位主义和小团体观念,使大家围绕工程建设总进度的目标来安排本单位的工作。这样做的结果,整个工地上呈现出“一盘棋大家走,龙江花遍地开”的生动局面。工人同志说得好:“你家,我家,干革命不能分家”;“你需要,我需要,服从全局最需要。”所有这一切,都生动地说明了加强领导的重要性。思想领导加强了,不断地批判修正主义,调整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能保证群众运动自始至终蓬蓬勃勃地开展。

金山工程的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整个工程还处在建设过程中,还有许多艰巨的战斗在后头。我们一定要不断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努力学好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一步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一仗一仗地打下去,多快好省地完成建设金山工程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努力把基本建设搞得更好

姚 尚

如何把基本建设的事情办好？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的基本建设是扩大社会主义再生产、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的重要手段。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还需继续努力。基本建设，对于我们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多快好省地进行基本建设，有利于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步伐，进一步增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有利于更好地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战略方针。我们战斗在基本建设战线上的广大干部、群众，都要充分明确自己的光荣责任，树雄心、立壮志，抓革命、促生产，努力把基本建设搞得更好。

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办好基本建设的事情，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什么时候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能充分调动起来，就能团结战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坚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把基本建设的工作搞得生气勃勃，多快好省。二十多年来，我们所以能够胜利地建成许多大型的现代化工厂、矿山、油井、电站、交通运输设施和遍及全国城乡的“五小”工业，就是因为广大干部、群众，排除了错误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坚持了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革命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为了使基本建设的事情办得更好，我们务必牢牢记住这条基本的经验。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也必然要反映到基本建设战线上来。国家每年把大量资金投入基本建设，怎样运用这些资金？基本建设战线有**几百万人**的勘察、设计、科研、施工队伍，怎样带领这支队伍？按照什么原则来处理基本建设战线各企业之间、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建筑企



业和其他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关系，要不要在这些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等，都有一个方向道路的问题，有一个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由于基本建设工作同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有着广泛的联系，因此，能不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仅关系着基本建设部门走什么道路，而且会对其他部门有很大的影响。当前，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要认真调查研究，联系实际，总结经验，切实把思想政治路线搞对头。这样，我们在抓任何一项基本建设的时候，才不致迷失方向，走错道路，才能使基本建设事业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

在基本建设战线上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求我们经常注意研究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积极地慎重地限制这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基本建设所需要的建筑材料、设备和施工力量，虽然主要是由国家按照统一计划分配和调拨的，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市场采购和由集体所有制单位提供的。在进行基本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和国民经济许多部门，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单位，频繁地进行商品交换。基本建设战线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同商品制度的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搞基本建设，无论安排计划、审查方案，还是解决材料、设备、施工力量等方面的问题，都应当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充分考虑是不是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

提倡在基本建设工作中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注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同多快好省地进行基本建设，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我们发展基本建设事业，同发展其他社会主义事业一样，说到底，是为了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产生的条件。如果眼睛只看到自己那里的基建项目，见材料就抓，见施工队伍就拉，而不从政治上、从全局的观点看问题，不考虑是不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这就会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根本上违背多快好省的要求。材料、设备、施工力量是进行基本建设的重要条件，当然是需要解决的，但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国家把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纳入统一分配和计划供应的渠道，既是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也是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正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优越性的表现。如果不顾政策，不择手段地乱抓建筑材料，乱拉施工力量，私自承发包基建工程，或者以协作为名，拿国家统配物资搞以物易物，把分配渠道的东西转到流通渠道，那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原则，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那样



做,不仅不能把基本建设的事情办好,而且正好迎合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需要,会使地方建筑材料和城乡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劳动力,盲目流动,从而助长农村的“重副轻农”、劳力自由支配等错误倾向,甚至会给新老资产阶级分子造成可乘之机。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有些地方出现建筑材料、施工力量不足的情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应当而且也有可能通过国家计划去进行调节。其实,从目前整个基本建设战线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施工队伍并不算少,材料、设备也有潜力可挖。关键是要加强领导,做好工作。有的地方所以一时出现被动局面,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路线没有搞对头,工作不得力,不敢坚持正确的原则、抵制不正之风。不少地方的经验说明,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敢于同错误倾向作斗争,又能从全局出发,统筹安排,保证重点,并且经常不断地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断改善经营管理,大力提高劳动效率,用现有的人力物力承担更多的建设任务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坚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这也是基本建设战线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坚持这个方针,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力、物力、财力的作用,既符合多快好省的要求,又有利于抵制和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根据需求和可能,从实际出发,集中使用人力、物力,就能把基本建设工程建立在可靠的物质基础上,使每一个需要上马的工程,能够从计划的渠道及时得到所需的材料、设备和施工力量,迅速建成投产。如果摊子大,战线长,力量分散,不仅欲速不达,建设项目不能迅速建成投产,而且还会人为地制造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供求矛盾,给资本主义活动提供地盘。我们需要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认识坚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个方针的重要意义,并认真地、切实地执行这个方针。

毛主席说过:“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一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搞基本建设也必须懂得这个道理。在战略上,我们一定要而且能够把各条战线、各个



方面的基本建设搞好，但具体的做法也只能各个解决。和打仗一样，基本建设也不是孤立进行的，要有各方面的条件相配合。只有根据需求和可能，分别轻重缓急，紧紧抓住关系全局的重点项目和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集中人力、物力，有计划地、有步骤地、一项一项、一批一批地进行，才能取得建设的主动权，迅速发挥投资效果，有效地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光有良好的愿望，不顾条件是否许可，企图一口吞掉一桌酒席，一下子就把什么建设项目都兴办起来，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会把事情办坏。许多事实证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就能多快好省，分散力量打消耗战，必然少慢差费。

要坚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必须提倡顾全大局的思想。“**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反映在基本建设战线上，难就难在有的同志胸中无全局。从局部利益出发，把本部门、本地区建设的重要性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总想多要投资，多上项目，甚至无视国家统一计划，随意上计划外项目，擅自修建楼、堂、馆、所等等；或者在本地区、本部门的建设中，不注意抓重点，搞全面开花，齐头并进。这都是缺乏全局观点的表现。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我们应当从全局出发，认真检查一下本地区、本部门的基本建设，是不是符合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要求，战线是不是长了，主攻方向是否明确，人力、物力、财力保证了重点没有？下决心避免那种战线长、力量分散、打消耗战的错误作法。为了全局，该上的就上，该缓的就缓，把好钢用到刀口上，把力量集中到关键处，真正打好歼灭战。

毛主席指出：“**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为了使基本建设事业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这对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建设是必要的，对一个工程、一个项目的建设也是必要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的建设工程，所以能收到多快好省的效果，就是因为上海各级党组织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充分发挥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通过广泛的政治动员，使全市人民群众都知道建设这个工程的重要意义，人人关心，争做贡献，并且组织了各条战线、



各个单位的社会主义大协作、大会战。许多这样的事实说明，发动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把建设的任务、理由、方法，向群众讲得清清楚楚，群众懂得了真理，就会齐心来做，就会一鼓作气把它做好。

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力量源泉。搞基本建设，无论是大工程还是小工程，是自造设备的项目，还是引进设备的项目，都必须坚持依靠群众，自力更生。以为引进设备的项目，就谈不上自力更生，那是错误的。引进设备，是为了吸取国外的先进技术，做到“**洋为中用**”，以发展我们自己的科学技术。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这些项目的时候，在设备方面，凡是**我们自己能够办的事情，就要坚持自己办**。在技术方面，要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要虚心学习人家的长处，又注意总结我们自己的好经验，使人家的东西真正做到为我所用。要做到这些，没有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不可能的。只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下决心，才能真正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在基本建设战线，继续破除承发包制度，积极推广大包干的办法，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承发包制度片面强调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建设单位互相制约，实质上是把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变成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买卖关系。早在一九五八年，我国广大工人群众就对它进行了批判，并且创造了大包干的办法。毛主席当时就指出：“**搞基本建设还是采用大包干的办法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地方的经验证明，实行大包干的办法，能够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从资金到设备，从建筑材料到施工力量，都能统一调配和调剂，既有利于各方面的团结协作，互相配合，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做到多快好省，也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抵制资本主义倾向。象承发包制度这样一些旧事物，我们需要发动群众继续批判，象大包干这样一些新事物，需要积极加以推广。从计划管理到物资供应，从政治思想工作到经济核算，从设计到施工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凡是合理的，就要严格执行，凡是不合理的，就要发动群众，经过充分讨论，坚决加以改革，逐步建立、健全一套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规章制度。我们深信，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只要各级领导认真学习和实践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放手发动群众，努力做好工作，基本建设事业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在抗灾斗争中锻炼得更坚强

山东诸城县新河崖大队党支部

我们这个大队，原来不叫新河崖，是叫惠家河崖。去年八月中旬遭到一场特大洪水，把整个村庄冲毁了，庄稼被淹没，房屋大部分倒塌。在上级党委的领导和关怀下，俺村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团结奋斗，依靠自己的力量，又建起了新的家园。贫下中农豪迈地说：“大水冲走了一个旧河崖，抗灾抗出了一个新河崖。”于是，就改名叫做新河崖大队。今年，我们的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五百六十四斤，一季过了《纲要》，向国家交售十一万斤，这个数字超出了全年征购任务的百分之五十。

新河崖啊，新河崖，这一年的抗灾斗争对我们的锻炼可大啦！它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对待自然灾害，同对待其它一切困难一样，不能有丝毫的怯懦和畏难。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任何灾害和困难都是可以战胜的。

去年秋天，我们大队满坡的庄稼一片丰收景象。可是，就在八月十三日这天，突然遭到一场暴雨，村前村后大小河流洪水横溢，平地水深两米以上，五百多亩庄稼全部泡在水里，全大队五百八十三间房屋，倒塌了五百五十七间，集体和社员的粮食损失了四十三万九千多斤，生产工具和社员的生活用品，不是被水冲走就是被砸坏。面对这种情景，有些人确实被严重的灾情压得有些抬不起头来了，说什么“多年的血汗一水漂，那年那月才能恢复起来”。

一些人把困难看得重一些，多一些，这是难免的。谁能说这场水灾不厉害呢！但是，人定胜天，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应当坚信不移的一条真理。大多数党员和贫下中农并没有被灾害所吓倒，他们在同洪水作斗争中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舍己为人的共产主义风格。摆在我们党支部面前的任务，就是如何正确地分析困难，认识困难，带领群众战胜灾害。这对我们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毛主席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



们的勇气。”大水过后，我们党支部成员和贫下中农一起，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感到格外亲切。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认真分析了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

第一，有党的坚强领导，有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战胜困难的根本保证。当着我们被洪水包围的时候，毛主席、党中央立刻派来了飞机，空投了大批熟食和救灾物资。各级领导同志涉水踏泥赶来同我们一起进行抗灾斗争。亲人解放军派来了医疗队，许多工厂的工人同志和兄弟社队的贫下中农，也从四面八方赶来慰问和支援。这不但在物质上给了我们巨大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党的关怀、阶级友爱的温暖，给我们的抗灾斗争增添了无穷的精神力量。

第二，我们遭受的灾害，尽管是严重的，但它毕竟是暂时的、局部的。五百亩被水淹了的庄稼，除了绝产和基本绝产的二百四十亩外，其余的二百五十多亩还能够有所收获。一部分成熟了的早秋作物有些可以抢收回来；二百亩晚秋作物，水过之后加大增产措施，还可望有一个好的收成。抓紧种好小麦，又能为明年的丰收打下基础。房子塌了，一部分物料还在，可以先搭起窝棚住进去。

第三，洪水冲走了房屋财产，但是，贫下中农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是永远冲不掉的。物质条件固然重要，但它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我们坚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党员和群众，是有能力战胜灾害的，这是克服困难的基本力量所在。总而言之，有困难，有办法，任何悲观失望的情绪和论调都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把这种分析和认识，在全体党员、群众中，进一步广泛宣传，使大家找到了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认识到自己的力量，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增加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更加积极地投入抗灾夺丰收的斗争。

正当我们带领群众进行抗灾斗争的时候，一小撮阶级敌人跳了出来进行捣乱。他们散布孔孟之道的“天命论”，胡说什么“命里吃八升，捞不着吃一斗”，还吓唬群众说，“今年是个大灾年，大灾大难还在后边”，到处搞破坏活动。个别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人，一心想搞歪门邪道，散布什么要来个“老牛过河，各奔前程”。这使我们警惕到，抗灾斗争不仅是人与自然的斗争，而且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必须针锋相对，首先抓好阶级斗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才能激发起人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夺取抗灾斗争



的胜利。

针对阶级敌人的破坏和一些人的资本主义思想，我们组织群众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忆苦思甜，开展革命大批判，深入地批判了林彪、孔老二鼓吹的“天命论”。贫下中农一针见血地指出，“天命论”是一副精神枷锁。历来的剥削阶级总是说受灾是因为我们劳动人民的命不好，得罪了“老天爷”，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我们要我们做大自然的奴隶，老老实实地听从剥削阶级的摆布。有的老贫农把这次水灾同六十年前的一场水灾作了对比。六十年前那场水灾，比这次水灾小得多，但是由于反动统治阶级不管人民的死活，还乘机敲诈勒索，致使当时仅有五十户的村庄，就有三十五户被逼下了关东，十三户妻离子散，全村二百四十口人就死去了四十九人。这同今天我们受到的党和政府的无比关怀，成了鲜明的对照。难道那个时候，我们贫下中农的命都不好吗？什么“天命”，完全是鬼话。我们还组织群众总结了一九六二年和一九七一年两次抗灾斗争的经验教训。一九六二年水灾后，由于受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一些人只顾个人，不顾集体，结果地里的积水没有及时排出去，轻灾变成了重灾。一九七一年受灾后的情况就不同了，党支部带领广大贫下中农，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日夜苦干，很快排除了积水，接着又采取增产措施，结果，灾年变成了丰年，这一年粮食每亩比一九七〇年增产了近百斤，跨过了《纲要》。事实使大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社员们说：“社会主义是靠山，集体力量大无边。”只要我们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紧紧依靠集体的力量，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才能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力量，同灾害作斗争。国家和兄弟社队的援助，是我们战胜灾害的重要条件，我们十分珍视这些援助，但是只有坚持自力更生，得到的援助，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没有自力更生精神，即使得到的援助再多，也是不行的。根据这个认识，我们在抗灾斗争中提出的口号是“自己能站起来，就不要别人扶”。受灾后，我们经过两昼夜的奋战，就搭起了一百二十个简易棚，解决了全村的临时住宿问题。灾后第六天全村就开始自炊，不要国家的熟食供应。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在洪水刚刚退走的土地上，挖沟排水，把洪水冲倒的一百多亩玉米、高粱，一棵一棵地扶起来，洗净泥沙，把一百多亩淤在泥里的地瓜蔓抠出来，加大措施，精心管理。抢种小麦的时候，有四、五万车肥料需要往地里运，可是全大队只剩下三辆小胶轮车，怎么办？有



人想向国家伸手，但大多数群众不同意那样做，他们说，国家对我们的支援够大了，我们不能再给国家添负担。妇女们主动把运肥任务包了下来，她们找来扁担和抬筐，日夜奋战了半个月，把肥料全部运到了田间。同时，我们还把各单位和人民解放军送来的工具、化肥、种子、水泥、药品等，交给公社，统一分配到各受灾单位。不光我们这一个队受灾嘛，我们应当使其他队的阶级兄弟多得一点援助。

毛主席指出：“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通过这次抗灾斗争，也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这个道理。在这里，最根本的条件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自力更生。我们这样做了，取得了好的结果。

抗灾抗出了丰收年。一九七四年抗灾夺得了粮食亩产四百七十五斤，除留足种子和社员口粮外，还向国家交售了粮食两万八千斤，做到大灾之年，对国家仍有贡献。今年春天，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社员群众的革命干劲更加高涨，我们又提出了“重灾面前志更坚，季上《纲要》年过千”的指标。麦季跨过《纲要》后，当前秋季作物长势也好于过去任何一年。社员们信心十足，都说，大灾促进了大干，大干带来了大变。

抗灾抗出了新村庄。洪水冲毁了旧村庄，我们又选择地势较高的地方，统一规划，集体盖起新房四百一十七间。现在的村庄是，道路整齐，新房成行，呈现一片新气象。

抗灾抗出了新思想。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的变化是大的，但是，更大的还是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抗灾斗争，锻炼了我们领导班子，锻炼了党员和群众。在救灾的过程中，一方受灾，八方支援，使我们开阔了眼界，看到了我们这个队虽小，但是它和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家更加热爱社会主义制度，更加热爱无产阶级专政，更加热爱人民公社这个集体。同时也积累了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经验。

我们取得了抗灾斗争的胜利，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挫折。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农业生产总是要在不断地战胜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前进，没有一点自然灾害是不可能的。我们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深入开展三大革命运动，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我们相信，有了这个思想准备，任何困难也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克服。

